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5月15日第7期 总第13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30期

### 教育专辑（五）

## 目 录

### 【“狼奶”讨论】

- 马昌海 唯物史观献疑（一）：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3.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4.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饶瑞农 “狼奶”讨论之我见

### 【专 稿】

唐 燕 《小美人鱼》和我们所缺失的爱

### 【述 往】

顾 土 我在文革中接受的“未成年人”教育

### 【以歌观史】

马昌海 歌声中的暴力——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红小兵越战越坚强》

### 【资 料】

军工红色造反团遵义兵团、红宝剑战斗队

戳穿党内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

狼狈为奸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军工红色造反团《红宝剑》战斗队

是“超政治”的教授，还是美蒋反动派的走狗

——剥掉曹鹤荪的几张画皮

四系 402 教研室全体同志 愤怒控诉反革命分子吴鸿钧疯狂攻击毛主席，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本刊记者 对吴鸿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读者来信】

叶维丽谈“清华工宣队”一文

### 【版权声明】

## 【“狼奶”讨论】

## 唯物史观献疑（一）

马昌海

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概念，其后又在189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它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sup>1</sup> 恩格斯虽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但并未对其作过完整表述。其理论体系是后来人们建构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诠释、质疑、批判、解构从来就没有停息。唯物史观存在的缺陷，多年以来受到多重质疑。涉及唯物史观、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大致包括如下内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创造者与历史动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停滞与倒退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与国家的关系；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改良与调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问题；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相关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的学者理应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吸收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切可靠的有益成果进行深入研究。

现仅就笔者的粗浅了解，将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概述如下：

##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运用我们所熟悉的唯物史观有关历史规律的理论，往往不能圆满地解释、甚至根本无法涉及中国历史以及由此而推演至世界历史的一些问题。比如：

## （一）殷周之际变革的动因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8页。

殷周之际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文明程度的急剧增长和由此而导致的文化精神的根本质变。正是在那个时期，多样的文化经过熔冶化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完成了周代社会文化内部的整合与向外部的扩散。在整合与扩散中，华夏族日益团聚为紧密依存的共同体，华夏文化日趋向着统一而又多样、高度有力的方向发展。

以往的学者往往从五种生产方式更替演变的角度，用社会制度的不同来解释，即殷商是奴隶制社会，而西周是封建制社会。但这种解释无法从殷周生产力水平差异的角度来证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因为殷人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水平领先于周人，那么周人何以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却能超越殷人？既然经济基础基本相同，何以上层建筑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发展来说，殷周之际变化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中国国家形态之所以能够完成由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过渡，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华夏族之所以能够在那么早的时期就趋于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所以在周代就得以基本确立，无不有赖于殷周之际的变革。所以，王国维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些变化的意义，远比“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进步”的所谓变化重要得多。

那么，导致这一巨大进步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巨大进步之所以在周初出现，究竟是必然的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对于这些问题，既然传统的理论无法圆满解释，便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新的角度进行思考。

## （二）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与统一多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众多民族以一个主体民族为核心而组成的一个绵延数千年共存且日益发展壮大的多民族共同体，先后进入这一多民族共同体生活圈的外来民族则无一不被其在文化上所征服，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在冷兵器时代，尽管存在着文化先进的民族被落后的野蛮民族武力征服的现象，但是这种征服大都有一个限度。像汉民族这样人口、经济、科技、制度、文化无一不处于极度优越的地位，却不止一次地被人口不及自己百分之一，且经济、科技、制度、文化无不远较自己落后的民族所征服，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自先秦以来，汉民族始终是极重“华夷之辨”的，结果却是不止一次地

被综合实力远逊于自己的“夷狄”所征服，而且还长期安于其统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与中华文明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其它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无不在近代工业文明远未到来之前便已归于消亡，只有中华文明不但从未中断，而且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何以如此？

再如，中国国家体制发展的早熟性、体系的完备性、组织的周密性，以及从未中断而且不断向更高阶段演化的特点，久已为各国的史学家所重视。实际上，中国国家体制的这些鲜明特点不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华文明得以始终延续的重要原因。这种成熟的国家体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国家体制为什么能够从早期国家发展到成熟国家？中国国家体制在不同的时期各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其渐进的演化过程各具何种意义？

上述这些问题，运用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理论，同样无法获得圆满的解释。

### （三）怎样解释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与文化发展差异

人类历史上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发展差异极大。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进入古代农耕时代的时间大致相同，而在数千年后，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已经判若云泥。至少在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我们可以看到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作为极其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而长期延续的“前国家形态”。那种把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序列视作依次演进、普遍适用且概莫能外的历史规律的认识，显然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

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的进步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依赖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一般来讲，知识积累越丰厚、科技越进步的人类社会，其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便越大。那么，何以在古代美洲和大洋洲这些自然条件并不恶劣的地方，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艰难？何以一些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古代文明未能获得充分发展便迅速衰亡？例如，埃及和巴比伦都是知识积累与科技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既然文明发展得如此之早又如此之高，何以那里的社会的演进并没有呈现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序列过程？

我国史学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讨论中，多数学者已经取得了历史发展是多元的而非线性的共识。但是，对于导致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发展差异极大的

原因究竟是什么，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哈贝马斯说：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尚未能全面解释社会进化问题，而只能说明某一社会现象领域。中国史学界因囿于传统的认识，在此方面的探究尤其缺欠。例如，对于世界各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的早期文明何以纷纷崩溃这一问题，国外史学界已有极多的研究成果，而我国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

哈贝马斯提出了不仅以生产力和社会形态、而且以“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来判断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他所归纳的“通过血缘关系而完成的社会一体化属于比较低的发展阶段、而通过统治关系而完成的社会一体化属于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观点，恰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殷周之际的变革。

当然，他所说的“一个社会是否会在发展过程中丧失其生命力，或者是否能借助于发展新的结构去解决它的体制问题，这取决于偶然的情况”的结论是过于绝对了，但事实说明取决于偶然的情况的历史的确是存在的。

周公所实行的改革恰恰是“通过统治关系而完成的社会一体化”改革。这一改革在客观效果上起到了打破旧有部族血缘关系的作用，亦即打破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属于比较低的发展阶段”的“通过血缘关系而完成的社会一体化”，促成了具有广泛的族别与地域基础的“华夏”政治联盟的出现，亦由此而使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进而通过礼制建设等措施，为最终形成具有共同的文化与心理认同的大文化民族提供了条件。

而殷代之所以尚无“天下”的观念，原因即在于殷王朝仍属于“通过血缘关系而完成的社会一体化”的阶段，广大地域被分隔成虽然内部一体化但相互之间却严重封闭隔绝的以血缘为界限的族邦。而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结果，实际是使周人在广袤的区域内建立了数十个强大的武装殖民点，虽然在每一个殖民点的周围仍然是敌对势力密布，但这些诸侯却是以共同的“华夏”自居，同气相求，遥为呼应，并尊奉周王室为共主。从而，一个远较既往的地域范围更为广阔、突破了原有族邦藩篱的局限与制约、规模空前宏大的社会一体化过程开始出现，一个大部族之“大邦”周围是众多非本部族的“小邦”、其远方更有许多敌对的“异邦”的局面开始被改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由是而形成。

“普天之下”概指极其广大的地区，“凡天之下的土地无所不包”。在部族社会时代，一个部族无论怎样强大，其直接的生存繁衍之地也只能是有限的区域，

之外是其他部族的生存繁衍所在。故强大的部族（如殷商）可以自称“大邦”、“大国”、“大邑”，却不会自称普天之下都是其生存所在。但周初封建诸侯的结果，却使周部族的生存远及极其广阔之地，这些生活在遥远地域的周部族共同听从周王的号令，由是而具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

周初的改革是否是必然的、一定会在殷周之际那个特定的时代发生？由于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取胜后，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改革：实行“天下宗周”的分封制度，改变了周初那种不平等方国联合体的政治格局，以武装殖民的方式在广阔的地域内建立起众多周系诸侯的强大据点，把周王朝改造成一个大规模的、宗法化的、以周王为宗主的同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的新型王朝。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周人原有的成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与现实的迫切政治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以“长治久安”为目的，以分封制度为基石，创建了发达的、以礼乐制度为基本特征的农耕文明政治——社会结构。由此，而使中华民族古老先民的国家制度、民族格局乃至文化精神，都较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长足的发展，发生了具有极其深远影响与重要意义的伟大变化。周公“制礼作乐”，本意不过是使散居各地的“诸夏”与杂厕其间的戎狄蛮夷相区别，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促成了具有共同心理归属感的“华夏”意识的形成，从而为大文化民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sup>1</sup>

## 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中国西周初年的变革之所以能够完成，原因有多种。从主要的、关键性的原因来讲，周公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虽有其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要，亦有其十分侥幸的偶然性因素。我们过去往往过于强调“时代需要”对于英雄人物出现的必然性，这实际上是以结果去解释原因，是历史研究中最实用也最简单的一种懒惰的方法。而当这种方法被冠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圣名义时，其影响就十分巨大而惊人了。然而，这种“存在即合理，发生即必然”的解释其实是靠不住的。倘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就只有承认：玛雅文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必然要夭折灭亡的。

<sup>1</sup> 王和：《再论历史规律——兼谈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新华文摘》2008.6。

而这种懒惰的方法恰恰是反唯物史观的。

殷周之际何以生产力并无变化，而国家体制与文明程度却发生了质的飞跃？是因为周公的改革极大地加速了“属于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通过统治关系而完成的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打破了“属于比较低的发展阶段”的“通过血缘关系而完成的社会一体化”进程，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形式，从“一族即一国”的封闭式族内交往，向多族混居所导致的族际交往不断频繁与扩大发展。换言之，虽然生产力没有变化，但社会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正是由于这一至关重要的变化，才使古代中国从“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早期国家”，最终完成了向“纯粹以地域划分居民”的“成熟国家”的过渡。

为什么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在发展速度上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什么有些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能够摆脱与突破部族结构的桎梏，而有些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则不能？制约与影响人类社会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究竟有哪些？这些问题与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以及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交往条件和程度密切相关。

从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来看，直至工业革命之前，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循序渐进地实现了比较充分发展的人类社会，但更多的是长期停滞在某种状态而几乎没有变化的人类社会。就任何一个具体的地区、国家或民族而言，都不存在“持续不断地进步”和“只能进步不能倒退”的必然性。不同地区、民族、乃至国家的人类社会究竟呈现为发展、停滞或倒退中的哪一种状态，取决于由自然环境的制约与人本身的活动所决定的多种因素。其中，人本身的活动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其结果中所显示的巨大差异，往往是由偶然的因素所导致的。周人代殷之后，周公因武庚的叛乱而采取断然措施，以将各部族混合武装殖民的办法“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从而于无意之中做出了有益于突破古代人类社会最难突破的部族社会桎梏的伟大创举，就是典型的例子。还有不少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又走向衰落乃至灭亡的人类文明（比如克里特岛文明、三星堆文明、玛雅文明及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文明）。所以，人类要有光明的未来，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自身的理性和智慧，而不是盲目的空泛信念。从这个角度讲，以进化论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传统认识，需要重新审视。

倘若今天仍然以“坚持唯物史观”为名，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共同



性，强调“社会发展形态”的一致性和普遍适用性，就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不合时宜了。何况“多样化的文明”、“多样化的世界”和“多样化的历史”本来就是客观的事实。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同一的、依次演进而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但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文明形态和文化精神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古代社会也同样如此。多样化的现实源自多样化的历史，而决不是凭空而降。正如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不同国家各自遵循符合其国情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世界一样，古代世界也是一个多样化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依据其不同具体条件而表现出不同发展特色和发展途径的世界。<sup>1</sup>

历史上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是不可预料的，是各种偶然因素促成的，或叫“逼上梁山”。我们今天看来必然发生的历史，常常是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没有这些偶然因素，必然性也没法形成。偶然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从历史的短程来看，偶然性非常大；从历史的长程看，必然的因素就会大得多。所以我们说历史是一种合力的作用，各种因素形成的一种合力。但既然是合力作用，它可能是向我们希望的方向，也可能是向我们不希望的方向，这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肯定只有一点，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人类社会向现代转变的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具体时间范围内它可能一会往左一会往右，一会往前一会往后，你很难去把握它，但大方向是一定的。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sup>2</sup>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大系统，社会内部有无限多个因素在交互作用。这些因素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等等。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经济因素作为必然性并不能完全决定历史事件，它只能规定历史发展的大致范围和一般趋势。“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sup>3</sup>正是这

<sup>1</sup> 王和：《再论历史规律——兼谈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10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1页。

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的”。<sup>1</sup>

“交互作用论”和“合力论”都是要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都是要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决定性)与偶然性及其关系,但是,二者研究社会历史的视角是不同的,“交互作用论”侧重于客体角度,而“合力论”则侧重于主体视角。<sup>2</sup>

### 三、暴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不同的历史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理论。不同的历史理论,也可以让人看到不同的历史景象。近百年流行的历史理论基本是外来的,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东西,外来的概念体系中却不一定有。因此,用外来的理论看历史,就可能忽略一些要紧的东西。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难免就要创造自己的概念,并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关系,建构更符合中国史实的理论体系。吴思先生因此提出了“血酬”、“法酬”和“元规则”、“潜规则”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历史唯物论里没有,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和财政理论里也没有。从“反行为”理念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上层政治与下层社会,各级政府之间有意无意地上下相蒙,猫腻盛行,形成一个“二相社会”,假天下和真实世界同时并存。吴思的潜规则与高王凌的反行为理念,背后都有这个“二相社会”。所以,反行为不是一个反抗的问题,是政府角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sup>2</sup> 刘曙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复杂性》,《湖湘论坛》2009.3。

色、战略定位、管理机制怎么定位，其不是社会冲突这几个字可以涵盖的。<sup>1</sup>

血酬是指暴力集团掠夺对象的价值。根据血酬定律，譬如民国时期东三省当土匪的死亡率是38%，而饥民饿死的可能性是50%，农民就会选择去打家劫舍；如土匪越来越多，血酬的价值也会一降再降。当抢劫的收入低于务农时，土匪就会重操农事。有可能回家种地，或者干脆自己开垦一块田地种庄稼。军阀地方政府为了短期血酬的最大化，常常会横征暴敛、杀鸡取卵；而黑社会土匪为了追求长期血酬的最大化，宁可养鸡生蛋，就会只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保护费。血酬定律可以推算出农民何时变成土匪，土匪何时回归农民，政府何时甚于土匪，土匪又何时成了有组织的政府。历史唯物主义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从暴力的角度观察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社会形态，一是封建主义形态，一是官家主义形态。这两种形态都是暴力集团统治的不同形式，但暴力分布的格局不同，这两种形式有重大差别。按照我们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式，仅仅凭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的纷纭变化。但加入新的解释要素之后，大概就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中国历史。

人类的暴力抢劫出现于生产行为之前。暴力行为不需要建立在生产行为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原始的生存策略。作为理论的起点，在设定初始自然状态的时候，应包含暴力要素。商鞅最早建立了一种暴力激励机制：军功封侯制度，这种机制使秦国具有了统一中国的制度基础。军功封侯制度发展下去就是封建制度，最终建立的是根据暴力进行资源分配的制度。西欧“采邑”（庄园）领主分封制（封建主义的法语词根为：领地、封地）：是封主向附庸授土，而附庸（被授土者）向封主宣誓效忠的关系。在当时浓烈的暴力争夺的社会生存环境下，弱者要投靠强者，强者也要拉拢追随者，结成一个团伙，这就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由来。所以，“采邑”是附庸（陪臣）因向封主提供暴力服务而所得到的报酬，封建制度是一种激励奖赏暴力的制度，是根据暴力服务而分配资源的制度。

在暴力高浓度的环境里，作为暴力集团统治形式之一的封建主义，具有鲜明的亲属色彩。亲属和模拟亲属组织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很好的社会组织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评价不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

<sup>1</sup> 见2014年5月6日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历史学对经济学的挑战”。

除了作恶之外，“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暴力不是孕妇，暴力能够破坏旧秩序，却不能创造新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补充了一句：“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展开。在谈论西欧封建制度时，历史唯物主义用了一个著名的概念：“超经济强制”。暴力属于超经济手段，只能看作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一种外来力量。如果这就是作为“经济力”的暴力，如果用一个“超经济强制”，就把暴力在经济史中的地位打发掉了，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也未免太小看暴力了。

西欧的封建制度就是以暴力为核心形成的生产方式。采邑就是对暴力服务的报酬，就是骑士的血酬——卖命钱。这种土地制度从根子上就来自对暴力服务的需求，正是在高浓度的暴力竞争环境中才会出现这样的生产方式。在封建生产方式产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因素本身就是创造新秩序的主导者。

唯物史观没有处理好暴力问题，没有在解释历史的基本框架中给暴力集团提供足够的安身之地。唯物史观对阶级的定义都是从生产要素角度定义的，马克思在使用阶级概念的时候，是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一路沿用下来的，即按照生产要素的不同拥有者来划分阶级。这种划分方式当然不错。但有的人是靠破坏要素吃饭的，凭借暴力打天下坐江山。对他们的成本和收益又应该如何分析？找到这方面的概念和分析方式，我们才能更透彻地解释中国历史。

那么，中国的暴力集团在哪里安身立命呢？他们是在法酬的基础上安身立命。法酬是由血酬转化而来一种高级形式，是靠收费征税的依“法”所得。在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博弈中，暴力集团有能力制造让生产者承受不了的最大损失：屠杀和摧毁。因此，暴力集团在规则制订中拥有否决权，这是制订规则的规则，可称之为“元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所有法规的设立，都来自这个元规则。凭着这一条，暴力集团就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吃血酬，吃法酬，凭着“元规则”立法定规，一代一代往下传。当然生产集团也可以反抗，让对手得不偿失。双方博弈的结果，就构成了具体法规的边界。如果直接介入生产有收益，暴力集团就组织生产，垄断市场。如果油水不大，他们就松绑开禁，给你一部分产权调动你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只管抽成收费。暴力集团可不管什么

政治经济分开，更没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框，他们只认法酬的利益最大化。

历史唯物主义不追究这套逻辑，因此就没有安插暴力集团和官家集团的位置，也无法解决中国历史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类混乱的问题。

以上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未处理妥当的问题及其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引进描述和分析暴力集团的概念之外，还可以调整或扩展一些重要概念。

首先是扩展阶级的定义。不是把阶级的定义落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身上，而是落在生存策略上。在人类社会，由不同的生存策略载体形成不同的阶级。第二是扩展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创造价值与暴力抢劫夺取价值都是对自然界供给不足的替代。因此，暴力掠夺和生产在层级上都属于第二级，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扩展了劳动价值论之后，暴力集团和暴力掠夺就有了价值论方面的根基。一般都认为暴力地位不高，先有生产才会有暴力抢劫，所以暴力掠夺是第二位的，生产才是第一位的。但从自然价值论的角度看，没有生产仍然会有暴力抢劫。

增加了分析暴力的概念和逻辑，扩展了阶级论和劳动价值论，就可以形成更贴切地描述和分析中国历史的新框架，而且，这个框架既尊重我们从小就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也尊重毛泽东的理论创造，还尊重了我们祖先的智慧。<sup>1</sup>

#### 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学说。其核心观点是统治集团治水直接介入生产（这种需要促成了国家的产生）。属于上层建筑的政府怎么搅入经济基础之中？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分类标准被亚细亚生产方式搅乱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的共识是：让事实修订理论，不能让理论扭曲事实。

中国的官家集团大规模地介入生产，很早就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买卖。个人贩私盐就要治罪。冶炼业一旦有利，也由国家垄断起来。到后来又有官田、皇庄，政府和皇帝直接控制土地，让太监替皇室收租。皇帝和官僚集团直接成了地主。一直到晚清，洋务运动的企业最初都是官府投资兴办的。

毛泽东在1960年代提出，中国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晚年还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无法容纳的说法。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阶级则是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当中得到定义的概念，怎么可以

<sup>1</sup> 吴思《官家主义：一种历史分析框架》，《博览群书》，《讲演录》2007.9。

从上层建筑角度定义阶级呢？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 1957 年写过一本《新阶级》，说共产党掌权之后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新阶级：阶级怎么能产生于上层建筑领域呢？这种说法在历史唯物主义里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到底是毛泽东和德热拉斯的说法不对，还是不能为这种说法提供立足之地的理论框架有问题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类，容纳不了上述历史事实，也容纳不了官家阶级或者是新阶级，所以就无法解释史实。这不是中国史实有问题，而是理论框架有问题。你如果对普通小地主们说，皇帝和官员都是你们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这些地主们肯定会觉得这是严重地贬低了皇帝。官与民之间是牧人和羊的关系，皇上是牧主，牧人和牧羊犬就是官员，说他们都是羊的代理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sup>1</sup>

顾准作为第一个将希腊城邦制度与中国历史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的学者，向他的母语同胞提示：“大陆务农领土王国”（也许包括古代集体治水因素），使华夏文明具有“大一统”、皇朝强大、不存在自由民（诰命大臣还不如罗马被解放的奴隶），缺少法权关系和法治观念等特征。这说明上层建筑的优劣，也可以决定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发展。顾准指出：“中国社会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只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者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有人奢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是使用简单的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无条件适合，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资本主义。

为了论证这个命题，顾准从西方历史中拈取了一些向资本主义进军的“落伍者”为例证。商业城市，惟有在适合的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其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她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市民阶级在转化为资本家的路途上，

---

<sup>1</sup> 吴思《官家主义：一种历史分析框架》，《博览群书》，《讲演录》2007.9。

为什么有那么多都倒下去了？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验科学滥觞于此，她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市民阶级在转化为资本家的路途上并不都是成功者，在社会转型期中，恰恰落伍者第一号就是意大利。”

顾准跳出窠臼，对上层建筑作用的分析已被历史证明。曾几何时，无规范的意大利，其南部变成了准黑社会（畸形的“民间社会”）。事实证明：没有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即使经济再发达，也无法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甚至可能出现新的悲剧。又如汉堡（由不来梅和卢比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撒同盟）12、13世纪后曾显赫一时；再如西班牙诸城市公社（西班牙首先发现新大陆，征服拉丁美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只能源于英国，顾准对此作了分析，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推论，说任何国家都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荒唐的：“特别是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一直到庚子、辛丑才被敲醒过来，说会自发的产生出资本主义，不过是梦呓！”顾准在这里强调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自古以来不过是世界上几个大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其他文明，例如中国文明，有过十分灿烂的成就，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的特殊的优越性。后代的我们，可以指出他的法权体系、思想体系是其强大物质力量由以长成的基础……。”对于中国的历史，顾准写到：“总之，西周奠基的礼，经过儒墨法道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汉以后僵硬化了，于是从上面对中国经济强加了一个桎梏，使中国陷入了两千年循环停滞的境地”。

顾准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只集中于一点感到不足：“即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共产党宣言》恩格斯附注）。因为这样的定义对于工厂手工业、农业或机器大工业都是适用的。顾准认为，对照中国的情况，还得补充以下几点：“法权关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清教徒精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忍欲”和“节约”包涵不了，还要

加上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上帝的选民”的意识，就是要以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这几种精神互相结合，可以表述为崇尚个人才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顾准同时也指出清教徒精神残酷的一面：如贩卖黑奴、残害儿童等，连基督教徒也谴责这些。顾准将清教徒精神，与来源于日尔曼民族的欧洲中世纪骑士文明结合，针对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进一步深刻剖析：“骑士文明……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等等的渊源。”“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和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不可不去的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作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志——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顾准将这种在中国值得提倡的个人主义（民主个人主义）称为“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

顾准处于那样的年代，居然结合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下大功夫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精神。他独辟蹊径地指出：马克思不赞成基督教清教徒的忍欲节约之说，可是他对这种清教徒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做过充分地估计，不过，没有也不会写进《资本论》而已。《资本论》全书要论证剩余价值的非正义性，当然不会说到这一点。马克思对清教徒精神的估计，散见于其它著作，也没有做过正面的赞赏。但是清教徒的创业冒险精神，忍欲节约精神、崇尚个人能力、力主个人权力神圣和机会均等，持有以自己的观念改造世界的愿望……分明是早期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其积极意义应当肯定。

顾准明确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一不足：“应当承认，这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持。没有这种精神支持，资本家哪里会有创事业的精神，哪里敢和贵族王权抗衡。……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舔一些太监的唾余，决不敢要求政权，就不足怪了。”顾准在文革的封闭环境中，独自取得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与他只听说过却未读过的马克斯·韦伯的成名专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几乎一样！这说明东西方学者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殊途同归。而顾准的高妙还在于，他又将这一研究成果与中国历史文化结合，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比较研究。<sup>1</sup>■

---

<sup>1</sup>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上海《社会科学》1981.5。



## 【“狼奶”讨论】

## “狼奶”讨论之我见

饶瑞农

贵刊近期关于“狼奶”的讨论，旨在从源头上挖掘戕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毒液。对于反思历史、避免悲剧重演，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狼奶”一说我早有耳闻，由于其隐喻的特定语境（对文革“狼崽吃人”现象的反思）“于我无关”而一直“置之度外”。128期《记忆》，“狼奶”讨论中任国庆、马昌海两位先生的文章将“狼奶”的源头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相关联引起了我的兴趣。

之所以感兴趣，因为我最近刚巧写的一篇小文，也跟“剩余价值论”所涉问题有关；而任国庆先生《一个重要概念的论证缺失——关于“狼奶”与“不变资本”的思考》指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证缺失，在于其立论条件“不变资本”和“劳动价值论”的不能成立。说来惭愧，早年那些“狼崽子”们“喝狼奶”时，我却正在一个“化外之地”兴致勃勃读着马克思；但由于不具备弄懂“价格”、“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这些经济学概念的学理基础，故而对《资本论》只是当成“抽象演绎的美文”大致读着，根本搞不清楚“剩余价值”的立论条件是否充分。

任先生文章设例简明扼要、推理环环相扣，对我回忆并检讨早年的“阅读缺失”颇有裨益。但是任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里，血腥镇压地主、资本家，不算残忍，不算灭绝人性。而只是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的必要手段。杀得越干净，美好理想实现的越快”这些话，似乎与坊间普遍流行的将马克思歪曲成“血海彼岸论祖师爷”的说法如出一辙。

据我所知，所谓的“血海彼岸论”好像出自徐志摩出访苏俄归国后一段话：“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诗人对“列宁主义”（极权主义）在苏俄实践的观察敏锐而深邃，其惊人的预见性也为二十世纪后来的历史所印证；但我觉得这“血海彼岸论”不能视为马克思的初

衷。其实任先生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理论传到了中国，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著名论断……”等现象，“这些理论”应该是所谓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吧？

如果说“追根溯源还是跟马克思脱不了干系”，倒是马昌海先生《地主的“剥削”与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狼奶”与地主》一文，开篇就将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追根溯源”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当然这原本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剩余价值学说……来源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视为价值的唯一源泉……该理论在实践中无法指导资源的配置，已被价值的供需决定论所取代。劳动价值论不成立，剩余价值、剥削、阶级斗争就无从谈起”；并随即将视线投向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农耕社会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乡绅文化”，旁征博引爬梳厘析其形成的条件、过程和社会作用。

马昌海在展开和“附录”中援引的大量研究者翔实、生动的文字，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中国革命错误地“将大工业时代初期的时间焦虑转嫁到了农耕时代的劳作之中”，而这是经由“革命文艺通过虚构的手段”实行的；二、它对“乡绅文化”的摧毁实际上破坏了这个农业大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乃至人际关系传统，尽管这些传统落后、“不合理”，但自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性；三、其后果就是超越历史条件的“破”、强行取代的“立”，造就了遗患无穷、祸害至今的“狼文化”。

请注意第一条。作者通过对一度曾经家喻户晓的“革命文艺作品”《半夜鸡叫》这只“麻雀”抽丝剥茧地剖析，为我们展现了“革命文艺”在“狼文化”中形成的特征及恶果。首先，它形成的第一特征，是攀附在能激发普通人心中基本良知、正义感的“大概念”上（拉大旗作虎皮），移花接木地将大概念抽象的理论内涵改头换面，呈现为生动鲜明、通俗易懂的故事形象，以达到蛊惑、煽动效果的最大化：“……在《半夜鸡叫》的故事中，通过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被描述为一个普遍性的关系。把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事活动修改为大工业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以符合‘剩余价值’理论，并作为其剥削本质的证明……

《半夜鸡叫》想要证明：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还试图通过控制时间来实现对雇工的经济剥削。”“这样写，唯一接近合理的动机，就是要使故事符合革命

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解释农业劳动和乡村的时间关系，以推动中国传统乡村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属性。周扒皮家的劳动情形所激发起来的并非现代时间意识，而是阶级意识，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直接图解和强化。革命文学的写作者以一种并不存在的时间概念，来唤醒对剩余时间的劳动价值观念，进而激发人们对私有制条件下剥削制度的仇恨。”

当然，还有宣传强度的最大化：“……战士“作家”高玉宝曾走遍神州大地，到处做报告学公鸡打鸣。从 1952 年在北京绒线胡同小学做第一场报告至 2009 年，先后做报告 5000 多场，听众 500 多万人次，一直到 82 岁才停止了这一闹剧表演……”

如果我们再想想《白毛女》、想想《放下你的鞭子》、想想《收租院》、想想从延安时代的“活报剧”到至今还在荧屏上频频亮相的“样板戏”，这“狼奶”的“源远流长”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伴随这“革命文艺”一路“高歌猛进”的则是一幕幕现实世界中的“血海场景”：

……1951 年上半年，我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美其名曰接受思想改造。我是下豫西工作队、驻陕州地区（河南西部）……土改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sup>1</sup>

下面的描述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如此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场景，“土改”非始亦非终！

于是“贫下中农”们开怀大笑了；“喜儿”们扬眉吐气了；“琼花”们报仇

---

<sup>1</sup>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http://www.fqccp.com/thread-39407-1-1.html>

雪恨了——但是，这一切究竟发生在舞台上还是现实中？文革时那些“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又究竟发生在现实中还是舞台上？想想看，这“革命文艺”的魔力，不就在于将“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生动鲜明、通俗易懂、感性直接”的意识形态乳汁灌输进一具具凡胎肉身，让其在“人生大舞台”上找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定位”而“得其所哉”吗？

其实对“革命文艺”（或称“红色文艺”）的研究，中外学者早已在进行了。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新闻联播》播出大佬们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时，我正好手头有英国西敏大学教授艾华（Harrit Evans）和胡杰先生与上述研究有关的两部纪录片。有感于其中某些画面与《复兴之路》高度一致的“共性”，遂以后者为底本剪辑PS了一段名为“再读胡杰《红色美术》”的视频小品，虽因技拙搞得很蹩脚；但那内容，今天看来就应该叫做“狼奶流淌”的。

总之我觉得，“革命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乳汁”就是“狼奶”，这是“狼文化”的主要内涵；而“狼文化”的产生，就是在那场暴力革命对“乡绅文化”的摧毁过程中“此消彼长”长出来的，它植根本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至于那张“虎皮”，则是从一只西方“死老虎”身上剥来披上的，扯下即可。

2015年4月18日

## 【专稿】

## 《小美人鱼》和我们所缺失的爱

唐燕（加拿大）

—

去年我的外孙 Clark 的暑假活动之一是参加了一个 Drama Camp（戏剧夏令营），二十个 8 至 10 岁的孩子在一位执导过《狮子王》、《美女与野兽》、《音乐之声》和《爱丽丝梦游仙境》等儿童音乐剧的资深导演和一位刚从某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大学生的指导，以及一位节目助理和两位志愿者的协助下，排练了百老汇经典儿童音乐剧《小美人鱼》。

两周后，Clark 邀请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和我、当然还有他的爸爸妈妈及 4 岁的弟弟去市舞台艺术中心观看了他们的汇报演出。到剧场后我们发现，20 名小演员的亲友们把小剧场的座位几乎坐满了。



## 《小美人鱼》

根据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海的女儿》改编：美人鱼爱丽儿厌倦了海里的生活，她不顾父王不许跟人类接触的告诫，对陆地上人类的生活充满好奇。在一场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夜晚，爱丽儿

（第一幕的一个镜头：王子和水手们在船上。两条小鱼在掀动波浪）救了沉船上的王子并爱上了他。女巫可以帮她变成人类三天，但要以夺去她美妙的歌喉为代价。三天内，她必须得到王子的吻（导演让不足十岁的两个男女小演员改为拥抱），

否则，爱丽儿将变回鱼并属于女巫，而女巫将用爱丽儿挑战她父王对海上王国的统治权。

爱丽儿的朋友们热情地伸出援手，设法帮助爱丽儿夺回了女巫装有爱丽儿歌喉的海螺，并破除了女巫对王子的魔咒。王子认出了曾经救他的爱丽儿，两人热烈拥抱。国王理解了女儿，并衷心祝福他们。全剧在欢快的婚礼歌舞中结束。

虽然，这个改编的音乐剧没有像安徒生的原著《海的女儿》那样点明：鱼不同于人有一个不灭的灵魂，爱丽儿毅然离开了瑰丽丰饶的海底世界，离开了自己的亲人，付出了所有，勇敢地使自己变成人，并得到了人类王子对她的爱，是因为这爱与灵魂相关。但是无疑，通过两周的排演，孩子们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爱”。

在《海的女儿》里老祖母对爱丽儿说：“只有当一个人爱你，对你比对他父母还要亲密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思想和爱情都投入到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他才会分给你一个灵魂，同时他自己的灵魂也才能保持不灭，你也才能得到人间的快乐。”

西方人经常以童话故事的方式向孩子们灌输纯正的男女之爱，他们注重爱的教育爱的熏陶，认为爱与被爱是人最重要最宝贵的情感 and 能力。尽管爱与生俱来，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生命本质，但是爱也要被培养被强化。爱的成长和提升需要爱的环境，只有在爱的浇灌和抚育中，孩子们才会逐渐感受、珍惜爱，并对他人无条件地付出爱、回报爱，心里才不会埋下仇恨和暴力的种子。

异性相吸是人类的本能和正常的情感，恋爱同样是青少年的人权和自由。恋爱可以满足他们渴望接近异性的心理，缓解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得到情感寄托，提高情商、智商和自信心，还可锻炼培养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情感经历在青少年阶段不可或缺，成长期有恋爱的体验不仅给日后的人生提供温馨甜美的回忆，还可为将来成人后的恋爱和婚姻打下坚实的基础。

西方人尊重青少年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鼓励他们有自己精神上的独立空间，同时告诫他们不可轻易偷吃禁果，从恋爱一开始就既要对恋人也要对自己的当下和将来负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些中国的学校和家长把青少年的恋情视为洪水猛兽、围追堵截，他们说只在中国人中广泛使用的“早恋”这个词很奇怪，

他们认为青少年在青春对异性产生好奇、好感甚至爱恋是美好的事儿，应该得到祝福和正确引导。

西方人还认为，爱的境界高于良心更高于道德。有爱，道德才有底线，才不会胡作非为，才能化解苦难和怨恨，恋恋不舍。抵消掉人性里的丑陋恨恶。没有爱，人性就被扭曲被泯灭。人人都有爱，彼此间才不会歧视和被歧视，才能有生而平等的理念，才能人人都享受到自由平等的权利；也只有每个人都享有资源。



（左图：这是小演员们高兴地在舞台作最后的合影。两周的集体生活从互不相识到结下深厚友谊。）平等、教育平等、机会平等，才会有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爱和被爱还能使我们“免于恐惧”，给人的心灵以安全、宁静、祥和和慰藉。

基督教更是主张爱人如己，提倡无条件无等差的爱，秉持慈善、助人、妥协、合作、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和非暴力的价值理念。基督教不把人分为阶级，认为因上帝之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兄弟姊妹关系，人的价值不以等级的方式体现，成功者的价值实现也不以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压迫为手段、为代价。

固然每个国家都存在不同的阶级，但有信仰的西方人认为，无论哪个阶级的人都应爱与被爱，都享有尊严，法律给所有人以同样的保护，下层的人不会受到歧视和虐待，不会有冤无处诉。公平正义的理念使阶层不再固化，社会日趋平等。

## 二

看外孙的演出勾起了我童年时排演少儿节目的回忆。记得小学二年级时，老师给我们排演了儿童歌剧《小熊请客》：今天是小熊的生日，小熊邀请他的好朋友们来家里做客。小熊边唱边做准备：“把地扫干净，桌子椅子擦干净。朋友来了多高兴，多高兴！朋友来了多呀多高兴！”

小熊为小兔准备了好吃的胡萝卜，为小猫准备了鲜美的小鱼，为小狗准备了香喷喷的肉骨头，为小鸡准备了好吃的虫子。

小猫、小狗、小鸡、小兔带着自己的礼物，分别唱着：

“喵、喵、喵，/汪、汪、汪，/叽、叽、叽，/哈、哈、哈，真呀真快活，今天过节小熊请客，我们到它家里去，又吃又玩又唱歌。”

路上，他们各自都遇到好吃懒做的狐狸，狐狸要跟他们一起去小熊家，但遭到他们每人的拒绝：“狐狸！狐狸！你没出息，你自己不劳动，还想白白吃东西，我呀，哼！我才不带你。”

他们小熊家吃了丰盛的晚餐，又唱又跳，玩的可开心了！

这时狐狸来敲门，被他们用小熊盖房剩下的松果打跑了。

他们高兴地唱“喵、喵、喵，/汪、汪、汪，/叽、叽、叽，/哈、哈、哈，赶走大狐狸，心里真高兴，跳起舞来唱起歌，高高兴兴作游戏！啦啦啦……”

从三年级（1959年）起，我们就开始排演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的节目了。

比如那时我们排了由我校老师自创的快板剧《人民公社好》：

三个高年级的男生扮演三位工人老大哥去新成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参观：

甲：“打竹板，响连天，咱们到人民公社去参观。”

乙、丙：“走，说走咱就走，（是）迈开大步走的欢。”

然后三人边说快板边绕着舞台走几圈后，到了人民公社：

丁：“听说你们来参观，社长我心里真喜欢。”

甲、乙、丙：“我们几个来参观，实在给您添麻烦，”

丁：（打断他们）“什么麻烦不麻烦，这么客气为哪般？”

他们参观了公社的农田、食堂、敬老院等后，来到公社幼儿园，我们三年级的几个女生扮演公社幼儿园的小朋友给来访的客人表演舞蹈“拔萝卜”。

最后，快板剧在“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中结束。

我们还排演过把歌曲《哈瓦那的孩子》改编成有玛利娅、爸爸、妈妈、庄园主四个角色的小歌剧：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爸爸爱我像宝贝，邻居夸我好娃娃，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爱的妈妈。

忘不了那一天，我坐在棕树下，爸爸他拉住我的手，叫一声玛利娅。孩子你已长大，仇恨该发新芽，你日夜想念的妈妈，她再不能回家。



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是牛马，可恨的美国庄园主，逼死了你妈妈。

妈妈她刚死后，爸爸又遭毒打，沉重的苦难逼着我浪迹天涯。爸爸去闹革命，拿枪去打天下，跟着那英雄卡斯特罗，打回了哈瓦那。

赶走了庄园主，建立了新古巴，工人和农民做了主人，再不会受欺压。祖国像太阳，生活像彩霞，可惜你亲爱的妈妈，没看到幸福的家。

听爸爸一席话，气得我直咬牙，我决心当一名小民兵，保卫新古巴。假如那美国强盗再敢来，一定要消灭它。

五年级时我们排演了歌剧《刘文学》，其中女声小合唱的一段歌词是：“天上的星星向我们眨眼，清凉的晚风多么香甜，社里的庄稼多么美好，丰收的海椒多么饱满。我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长大要去开拖拉机，奔跑在祖国的田野上，翻起片片肥沃的土地。亲爱的毛主席，我永远听你的话，我永远跟着你，把我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

接着的男声小合唱，我只记得第一句：“忽然间一条黑影闪进了海椒田，刘文学急忙赶上前……”

上中学后，特别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我们表演的多是“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一类的节目：“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所以我们要“夺过鞭子——揍敌人！”

正如 Clark 们在排练《小美人鱼》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被浸润了爱，少年的我们也在排演这些节目中不知不觉喝了“狼奶”，被或多或少灌输了恨。

“狼奶”的主要成分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它灌输仇恨，并将仇恨演变成血淋淋的杀戮，它反人类反文明，扼杀人伦之爱。喝“狼奶”的结果颠覆了我们正常的思维方式，扭曲了我们的道德标准，摧毁了我们做人的良知，使我们形成了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网查，被狼哺育、喝狼奶长大的狼孩其特点是：性情残暴血腥、不会说话、不惧怕黑暗、不会直立行走。因为他们从下方摄取对外界的印象，所以毫无可能发展人类的智慧。科学家对回到人间的狼孩观察、训练和再教育的实践表明：儿童时期是人心理生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回归人间的狼孩要想改掉狼性极其艰难。

我们这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不曾挺起腰杆抬起头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真实的世

界，而是从奴化教育中认识周遭。在传统的亲情伦理被迫让位于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我们缺乏爱和善的培养以及优秀文化经典作品的熏陶。我们怀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感，无所不用其极地惩处包括麻雀在内的一切“害人虫”，丧失了上帝赋予我们的良知和恻隐之心，以恨、斗为使命，以粗野、嗜血的狼性为光荣。

我们对学校以外的事一无所知，以为唯有我们生活在被革命先辈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及一切地富反坏的清平世界，是最最幸福的一代；我们真诚地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人类。

一旦我们的实际感受与报纸广播教科书的宣传不符，我们就产生负罪感，立刻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驯服。我们宁愿相信宣传也不相信自己的感官，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现实生活的美好，正如那首歌所唱：“一块红布蒙住了我的眼睛，你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我看到了幸福。”结果我们人人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标准件，彻底失去了判断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没有独立的人格。

初中政治第一课，我们学的是毛主席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被教导中国社会被分为不同的阶级、对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要充满仇恨，“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既然是对敌人，就怎么歧视虐待斗争打杀都不过分，根本不懂得尊重生命，不懂得任何人包括“坏人”都应该有人的尊严，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哪怕是罪犯也应该得到尊重。

文革初，我们活学活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添加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等等更多的阶级敌人，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只知爱党爱国爱领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爱，不懂得对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要有爱。我们爱的天性被扼杀，不会用爱的眼光看世界，结果变得孤僻、冷血、偏执、好斗，一旦遇到文革这样的环境，人性恨恶的一面就被激发出来，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在个人崇拜的迷幻里，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中，以造反有理的强烈表现欲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暴露出极其血腥残暴的狼性。

正是由于“狼奶”的哺育，在“红八月”里，红卫兵才戴着八旗子弟血统高贵的蛮横，义和团的愚昧、党卫军的残忍抄家劫舍、滥杀无辜。

那时亲人之间没有爱，因为“亲不亲，阶级分”。即使你的亲娘老子是红五

类，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如若你的父母、亲人已经被划为或突然被发现是黑六类，你则要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六亲不认，甚至大义灭亲，最典型的莫过于揭发自己母亲的“反革命”言论并致使母亲被执行死刑的张 x x 了。

那时同学同事当中、邻里之间没有爱，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都建立在阶级性的基础之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弦被绷得紧紧的，人人时时刻刻瞪着警惕的眼睛，关注着身边阶级斗争新动向。以至于运动一来，就彼此揭发批判，为了自保出卖亲友，落井下石。

那时夫妻情人之间不能谈情说爱，连“婚恋”这样的字眼都被摒弃，代之以“问题”和“作风”：结婚是“解决个人问题”，男女之间没有做到“授受不亲”时，就是发生了“作风问题”。

那时最侮辱人的话是“流氓”，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是“有生活作风问题”。如果某人男女关系不检点，就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领导必深入调查严肃处理，群众则同仇敌忾将其批倒批臭。

文革中，往往有数个胸前挂着“大流氓 xxx”牌子的“男流氓”和脖子上挂着破鞋的“女流氓”尾随在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们后面一起被批斗、被游街；各种层出不穷的学习班之一即“流氓学习班”，其学员从此背负上耻辱的“红字”，再也无法正常生存，他们当中有些被定为流氓罪后送去劳动教养。

在这样环境下耳濡目染成长起来的我们，对男女之爱的认识无知、愚昧、畸形，违反人性，只有中世纪的水平。打击流氓和流氓活动是红卫兵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我校孙迪老师正是因为所谓“耍流氓”被北京 36 中的红卫兵打死；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一个袁姓外校人员指控有“男女关系问题”，极大地激起了红卫兵的义愤，是其被打死的重要原因之一；女附中的红卫兵还曾把她们学校附近餐馆的一位正谈恋爱的 18 岁女服务员打死，其“罪名”即“女流氓”；有着“理性、克制”之美誉的北京四中红卫兵，据说对他们本校的“走资派”还算讲政策，可是对社会上的“小流氓”却大打出手，毫不留情。

### 三

“狼奶”把我们哺育成了精神上的石男石女，两性之爱自然是我们的盲区、禁区。那时外国电影、小说里描写的爱情统统是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肮脏无比

丑陋不堪。万恶淫为首，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只应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文革期间，我们像被输满了毛指令的机器人，只顾疯狂“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荡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上山下乡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思想才是我们的主旋律，对男女私情连想一想都是罪恶。

特别是出自男女分校的我们下乡前很少接触过年龄相仿的异性，对彼此的性、举止、言谈、爱好、情趣等等一无所知，没有感性认识，根本不知道如何对话、交往、相处。在异性面前我们异常紧张、脸红心跳、语无伦次、手足无措。结果同一知青小组的男女生即使天天在一个锅里吃饭，也因视而不见，互不理睬，一点儿都不互相了解。

当与我们不得不有所接触的男生组长偶尔向我们表达关切时，我们虽然内心感激，外表却装出讨厌他的样子。即使在下乡三、四年后，有时爬坡过沟，我们也宁可绕远道，拒绝接受男生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我们伸出来的善意的手，怕跟他们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肢体接触。因不知如何应对男生，我们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表现出一副清高孤傲的样子。

记得我们女校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两个假小子，她们不买花衣服，从不穿裙子，头发剪得短短的，性格更是豪爽大气，活脱脱一副男孩的样貌和神气，博得很多同学的喜爱。而那些娇小懦弱、爱发嗲喜打扮的女生则被我们视为资产阶级的小姐作风，称她们为“娇滴滴”，为我们大多数同学所不齿。多年后我们才懂得这其实是禁欲主义的女校特有的现象和弊端，我们在男生面前的不知所措，乃至思想极度僵化正是女校留给我们的后遗症。

然而再贫瘠的土地也会开出芬芳的花朵，再苦涩的青春也必萌发爱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开始大彻大悟，以前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渐渐松懈了，革命意志终于衰退了，对唱红歌和样板戏不再感兴趣的我们对《外国民歌二百首》爱不释手，当然只是我们女生关起门来偷偷地自娱自乐。我们迷恋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憧憬着“青年旋工和铁匠他俩谁更可爱？哦，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的甜美意境；我们把带有爱情字眼的歌词改头换面：“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到河里游来，甜蜜 love 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青人就

是这样‘没出息’！”

至于我们这代人的婚姻，幸福美满的实在不多。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话：“有爱情的婚姻是幸福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以我们插队知青这个群体为例，大致有这么几类：

1、有的因出身不好，经过文革“红八月”的洗礼，她们在政治上倍受歧视，经济上没有后援，情感上无所寄托，甚至由于已经或几乎家破人亡而无家可归，加上年幼无知不谙世事，下乡后在受到欺骗和胁迫后，就糊里糊涂地把自己嫁给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贫下中农，结果以悲剧告终。在她们注定不和谐的婚姻生活里只有性没有爱，不可能在精神上情感上与她们的另一半互相抚慰，她们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爱情的无知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

2、那些被强奸的女知青们，很大程度上是被色狼占了她们没有性知识、不懂性防范，在性教育上缺失的便宜；更多的则是被社、队干部利用权势受到的侮辱与损害。那些村干部可能一开始只是对她们猥亵，但她们因怕以后被在招工招生时穿小鞋，不敢坚决反抗，更不敢声张，结果被认为软弱可欺。可怜她们不仅遭受了政治权力的欺压，还进而受到性的蹂躏和糟蹋，身心俱毁。结果她们终日在无比羞耻、悔恨、痛苦、内疚、自责、恐惧、愤怒中无法自拔，从此孤僻、冷漠、抑郁，万念俱灰，没有安全感，不再信任任何男人，对自己自我保护能力严重怀疑，觉得自己不再纯洁了，没有价值了，今后不配有美好的爱情和生活了，以至于一蹶不振，失去生命活力。其中有的为了维护自己的高贵和尊严把爱的心门紧闭，始终未能摒弃陈腐的贞操观念，终身不嫁。精神的刺激和心灵的破碎最难以弥合，她们为此终生都背负着这沉重的十字架。

3、有些知青经过几年的朝夕相处，从相知到相爱，从友情到爱情，终于可以谈婚论嫁了，可是或因家庭出身的阻碍、或因担心影响返城，不得不舍弃了自己的神圣情感，误以为爱情还会再次降临到自己头上，结果错失了一段不可复制的美好姻缘，造成终生遗憾。

4、那些下乡数年后终于被招工招生离开农村、特别是已近三十岁的老高中生们，经过媒人介绍，省略了自然相识、彼此吸引、从友爱到情爱的全过程，终于开始起步“谈朋友”了，却发现经过那段蹉跎岁月，她们的“青春像小鸟，飞去再也不飞回”！别说白马王子、梦中情人，就连能让自己稍微心动者都难以寻

求。她们只好不再寻找真爱，只要对方愿意，不顾自己的感受为结婚而结婚，以便阻断父母亲人的唠叨和邻人同事的闲言。还有的知青返城后，不仅被社会难以接纳，还因没有栖身之处，只好草草找了个“有房的主”；更有的则作了小三，既然时代无情地剥夺了她们爱的权力，她们要把爱不择手段地夺回来！

5、那些一次次招工招生无望，留在村里所剩不多的男女知青们突然发现，“同是天涯沦落人”，共同的命运已经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了。他们跨越了不懂爱情的尴尬，感情日笃，终于建立了婚姻关系。他们当中不乏圆满的爱情结合，但也有一些与其说因爱而结缘，不如说是搭帮过日子。结果返城后，其中的少数决绝地抛弃了自己的发妻，与小三结了婚。他们说：有了她，我才真正体验到灵肉相融的激情燃烧，从而彻底实现了彼此生命的意义，那种甜蜜和与原配的感觉绝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到今天我还拒绝承认、不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还像以前那样每天都为无爱的婚姻失去自我，我这辈子就真的是白活了。

6、那些起初因胆怯而回避接触异性、对男生缺乏了解和信任、不懂爱情、不曾恋爱、没有抓住机会、放弃不了自己对理想爱情的美好追求和向往，宁可身体空虚绝不接受精神空虚，因而终身未婚的知青不在少数。她们曾经成了妇联发动全社会企图解决的“社会问题”。

7、那些找了“小芳”的男知青只要是建立在爱情牢固基础之上的，无论后来命运如何变化，都对“小芳”未离未弃，成就了一段段感人的美丽佳话；而当年只不过为了排解寂寞，顾不得考虑空洞的未来，跟“小芳”的结合只是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权宜之举者，当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时，分手便在所难免了。

今天，我们中更多的人仍在畸形的婚姻中对社会、家庭、婚姻、子女“负责”着、隐忍着。有的调侃说，我虽然没有体验过什么“爱情”，但我和他/她之间应该已有了日久而生的亲情，且把亲情当爱情吧！固然，古今中外每个时代都有无数没有爱情的不幸婚姻，然而我们这代人中特有的形形色色的婚姻悲剧源于我们对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成分的“狼奶”的摄入，源于血统论的肆虐，源于我们受的教育中所缺失的至关重要的爱。■

## 【述 往】

## 我在文革中接受的“未成年人”教育

顾 土

未成年人，是当今最盛行的说法，有的国家定为20岁以下，有的国家是16岁，而在我国，目前定在18岁以下，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不过，在我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未成年人保护这一说，还竭力鼓动少年儿童向大人看齐，不惜生命与阶级敌人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国家财产、远离父母上山下乡、放弃学校学习去“三大革命实践”中锻炼、坚决与有问题的家庭划清界限，而在文革中，学生批判老师、孩子揭发家长、晚辈斗争长辈，更是社会生活的主流。

## 放弃读书 崇拜领袖 批判老师 斗争长辈

文革发动那年，我正在北京读小学三年级。三年级以前，学校还要求我们见了老师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经常受老师表扬。1966年以后，不但向老师鞠躬不需要了，而且优秀教师几乎都成了批判对象。我就读的府学胡同小学一连揪出了多位老师，其中，校长是走资派，被剃成阴阳头，她的儿子姓高，和我同班同学，从此就不来上课了；和蔼可亲的王立人老师成了军统特务；还有一位教体育的田老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据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曾泅渡投敌，但没游过去；我的班主任孙纹绣，温文尔雅，对待我们如慈母，最后也被停课接受批判，原来她的父亲是孙良诚将军，毛选里点过名的人物。

我哥哥与我同校，他的班主任姓王，经常来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身边还带着一位智障女孩，也是我哥哥的同学，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女儿。智障是近些年从台湾传来的称呼，过去我们用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词汇，比如傻子等等。王老师的牢骚也让我记住了另一种声音，她说小学校长才是科级，怎么也是走资派？孙纹绣从前不过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怎么会反革命？但王老师很快就不来串门了，因为打砸开始了，各种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断被揪出，社会混乱不堪，最后连那位智障同学的父亲也成了“杨余傅反党集团”的头子，她不知去了哪里。

文革开始，课本也停用了，我们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再加点算术，音乐课都是歌颂毛主席的内容，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阿佤人民唱新歌》，用一架风琴伴奏，旋律很好听。那个年代，“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是全国人民经常使用的套话，报刊上用，发言时用，连小孩子都会用。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阿佤人民唱新歌》，虽说这也是一曲赞歌。

有一天，学校门口开始重新设计影壁，一位美术老师站在那里日夜毕恭毕敬地作画，没多久，油画“毛主席来安源”在我们学校也复制成功了，这幅画当时普及全国各个角落。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早上一进校门就要向这幅画鞠三个躬，然后凑在一起高举《毛主席语录》，呼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福三遍是必须的，还要高唱《东方红》，进了教室上课时再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放学时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一段时期还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坐在教室里的标准动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下方，将语录封面朝外，放在胸前，目视前方，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时的统一动作。

那个年代，除了领袖像遍布任何场合、任何地方外，就是像章大泛滥，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不仅人人胸前别着一个，家里还都有几十个、上百个、甚至上千个。我们院里有个历史系教师自己在家开作坊，专门制作毛主席像章，据他儿子告诉我，一共做了一万多个，什么材质的都有。前几年，一位部队文工团的朋友去朝鲜访问，回来后大发感慨，他说即使领袖崇拜，人家也比我们严肃百倍。在朝鲜，像章有一定之规，不许乱做，呼喊万岁的声音则是排山倒海，最终汇成一股声音，而他当年多次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百万人喊声虽然巨大，细听还是杂乱无章、此伏彼起。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我经常跟着小伙伴去撒传单，因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子弟，所以传单有人大三红的、新人大的、红梅战斗兵团的，这些都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传单上写的全是些揭发批判“黑帮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文字，还有漫画，传单撒出去后，街头大人蜂拥而上，争抢传单，看了这样的情景，我们的心里很过瘾。我还经常把外面的一些宣传品带到学校，记得有一次我抢到了一幅“百丑图”，上面都是党政领导人的



漫画像，从刘少奇开头，一直到省委书记和部长，孙纹绣老师当时还没被停职，她见到后很不满，叫我今后别拿这些东西来学校了。

我们小学的高年级同学很快都戴起了红袖箍，男女同学个个身穿绿军装，扎着皮带，还骑着自行车，下车后一定要手持钢丝锁，插着腰。这身打扮和姿势在当时的街头巷尾最时兴。钢丝锁可以随时抽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也可以与对立的其他组织武斗，打群架，以此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中六年级有位同学姓李，是个高干子弟，经常来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实才四年级，特别喜欢跟着这位姓李的大哥混。李大哥经常过来告诉我们兄弟三个，什么如今最流行，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如何抢军帽、以后还知道了“拍婆子”。那时戴绿军帽很盛行，一次，他来的时候戴了顶厚帽子，也是绿的，两边的帽耳朵放下来很暖和，扎上去很帅气。我哥哥看见了也想要，我父亲设法去买了一顶，没想到戴了不几天就在街头被人家骑着自行车一把撸走了。李大哥知道后，问了被抢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来，我们因此更加钦佩这位大哥了。但没多久，他就因为参与武斗被拘留，被定为“联动分子”，后来又听说被释放，最终也没再见过。

文革前，我母亲为我们兄弟三个念过《红岩》，让我们背诵过《革命烈士诗抄》，在广播里听过《青春之歌》、《王若飞在狱中》、《革命一家》，看的电影有《满意不满意》、《今天我休息》、《锦上添花》、《红日》和《冰山上的来客》，还有《昆仑山上一棵草》。文革开始，才知道这些都被定为毒草。当时的电影、小说好像绝大多数都被定为“封资修”的毒草，我读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60部小说毒在哪里》，读得非常细，还学会了里面的各种形容词。破“四旧”运动到来时，我家里赶紧将《普希金选集》、《日日夜夜》和《古文观止》等藏了起来，但院里的几位小朋友揭发我家里的小人书都是反动黑货，我只好将这些小人书抱了出去，这是些由《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改编的连环画。院里烧书的火堆整整燃烧了2天，许多线装书、世界名著都被中学来的红卫兵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扔进火中。

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是叛徒而且最终畏罪自杀的有关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觉得阶级斗争真是尖锐复杂，老师、叔叔、阿姨还有外面那么多人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连《红岩》都是大叛徒写的大毒草，看来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定要绷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我们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间又加剧了这种教育。那个时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没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哄，成为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从前称作铁狮子胡同一号，所以大家就叫铁一号。铁一号大院里谁家大人被揪出来了，我们就朝谁家扔石头，弹弹弓，欺负谁家的孩子，我们还特别警惕陌生人，一见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就会跟踪、尾随。院里的公共楼道和民国时期的老建筑一灰楼，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学校里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学们砸破，老师根本管不了。院里还常常被人举报有反动标语，警察不时跑来，又照相又侦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看出毛主席三个字，其它模模糊糊，其实就是乱写乱画。

在街头看游斗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内容。铁一号院子里的游斗是边走边斗，脖子上用铁丝挂着块大牌子，在院子里绕了一圈，最后走到那座民国老建筑灰楼前停下。这里是个较大的空间，既可以让过往行人都看见，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斗的人都是站在台阶上，低头对着大门，一斗就是几个小时。也有斗争的群众认为被斗的不老实，就将几把椅子、凳子摞起来，让被斗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见过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副教授，因为工资被冻结，实在没钱买东西吃，饿极了，就在东四九条副食品商店里偷了7分钱一包的人参果，结果被售货员当场抓住。批斗他时就是站在了两把椅子上面，好像演杂技那样，专门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与我父母很熟，他说，这样才能让大家看清他的丑恶嘴脸呀。而马路上的游斗常常在卡车上，时常看到路上有游斗的卡车或缓缓驶过，或疾驶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数人，被两侧戴红袖箍的人按着头，反扭着胳膊，呈喷气式模样。卡车的驾驶棚顶安放着一高音喇叭，插着红旗，一路呼喊着打倒、砸烂的口号。

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强迫做“喷气式”。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一脚。

文革发动没多久，红卫兵还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我的祖母当年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所以此时也在劫难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

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她的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也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那个年代，北京火车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凄惨的景象，一群群年迈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阴阳头，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蓬头垢面，个个犹如被打上了印记，一看就是被遣返回乡的“黑七类”。他们拎着包袱，低头匆匆往车站里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们吐痰、扔石块，甚至踹一脚，打一拳。返乡的一路上，他们在车厢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对象，在长途汽车同样是众人欺负的弱者。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文革期间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大院游斗，说是让邻居认清反革命黑帮分子真面目。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里不断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 高喊打倒 围观抄家 领教武斗 下放劳动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孩子除了学语录、唱颂歌、向领袖像鞠躬、批斗老师、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报和捷报，学校要求我们晚上只要有重要广播，都必须在广播后到校集合，然后游行、学习。最新指示发表、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九大闭幕，我们无

不上街庆祝，高呼口号，一直折腾到深夜。我们还参加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相继到缅甸驻华大使馆、印尼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外示威，嘴里高呼过“打倒吴奈温”“打倒苏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不知去过多少次，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游行更加起劲，嗓子都喊破了，那条路也早被改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后40来年，除了战斗英雄孙玉国的事迹外，珍宝岛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离开了社会舆论的视野，难道领土问题也分时段？

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是文革前期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抄家，在那时最为常见，我经常跟着四周的小伙伴一起去看院子里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只见屋主人低着头站在门外，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箱箱的东西被装上卡车运走，书籍、手稿、笔记本、相册、绘画、书法、首饰、存折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时的抄家由谁来定，似乎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据我所见，有专政机关，有群众组织，甚至也有几个红卫兵自己就能敲定。那个年月，夜半查户口也是一景，家里的大门半夜里突然就会被擂响，有人在外高喊查户口，每次开门后进来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既无证件，也无制服，手持手电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我从红卫兵小报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国武斗很盛行，最厉害的是保定、郑州、柳州、重庆、武汉，远比人民大学的两派对垒凶残得多。有一位远方堂兄住在广西柳州，一天忽然间投奔到我家。据他说是躲在货车里逃出来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军的进攻，除了飞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铁棍向他砸来，幸亏他用左臂一挡，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却断了，我们因而称他为“断手哥哥”。我和父亲陪着“断手哥哥”去动物园，在那里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孩正乞讨，“断手哥哥”告诉我们，这个男孩与他同在一列火车上逃出了广西，男孩的父母在武斗中双双丧生。

在小学，学习的榜样是刘文学，还有龙梅和玉荣，所以，我们脑海里被深深植入这样的意识：见到阶级敌人破坏一定要奋不顾身去斗争，见到集体和国家财产受损一定要舍生忘死去抢救，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雕塑《收租院》，学校专

门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纪录片，说是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结果留下了两个难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经过多少年之后，水牢大概人们早已忘却，可喝人奶竟然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延续下来，化作许多老板和领导的偏好。那时小孩子之间流行一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听起来似乎个个崇尚拾金不昧，实际上歌词早被改成：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卖冰棍的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孙子，找钱！

讲用会也是我们的课堂内容，讲用就是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所以讲的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有时请外面的模范人物，也有时就是自己讲。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因为讲得过于频繁，所以就拼命想法编故事，不然，无话可讲。我们最喜欢编的是在路上如何捡到一毛钱、五分钱，原本想自己揣兜里，拿着买冰棍买糖果，后来想起了毛主席教导“要斗私批修”，所以就交给警察叔叔，或者老师。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编，但交老师不能不确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学就自己交出零用钱，以便获得表扬。劳动时想偷懒，后来脑海里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也是同学最爱讲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好处就是真假难辨，永远无法证明。

在这样的环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余江。我的父亲先去了那里的五七干校，过了大约半年，我们和母亲才从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车到达鹰潭，当时鹰潭称镇，半夜又转乘轮船沿着信江，由水路抵达锦江镇。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干校在刘家站，一个小火车站，而我们兄弟三个则独自住在锦江镇，那年哥哥13岁、我12岁、弟弟9岁，自己照顾自己，一个季度才能与在干校劳动的父母团聚一次。我们吃饭可以去五七干校驻锦江联络处的食堂买，最困难的是去井台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进井里，

锦江镇位于信江中游，是座千年古镇，也是过去的县衙所在地，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还有座很有名气的天主教堂。可惜，自从私营商业被取消后，店铺大都关闭，成了住房。我家开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缝铺里，面积不小，后面有灶间，前面有铺面，上面有阁楼，本来住在这里的裁缝一家早已经被下放到偏远村子里去了。因为这里潮湿，半年后我家又迁到不远处的一家楼上，楼下住的是房

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两个民兵的押解下去劳动，可算一算年纪，1949年他也不过就是个少儿。

锦江镇的中小学合在一处，已经改名为五七学校，其中小学是五年制。课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语录，再加点算术和唱歌，一周还有3天是劳动，往6公里之外的农场送粪。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前后装着满满的大粪赶往农场，学校规定一天必须挑4个来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颂歌外就是歌颂解放军，有一首歌我至今记得，用的是当地民歌的调式：“我们的解放军好、解放军好、解放军好啊啊啊，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举得高，举得高，噢噢噢……”学唱样板戏这时也已经进了课堂，一次，全班同学整整唱了一节课的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军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不排队。1970年的春节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买凭票供应的节日肉，可排到傍晚才买到一个猪头，他说，肉都被前面的解放军家属买走了。从那时起，我和哥哥都想当解放军，当解放军起码有买东西不排队的特权。

在五七干校，有几件事情让我产生了与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骑着自行车走了50多里路去刘家站看我父母，干校的男女一律分开居住，父母相距很远，我住在了我父亲那里。当我看见有些叔叔不但农活干得不错、盖房子的手艺挺高，而且喂猪也喂得好时，难免疑惑，因为几年来的教育都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当时冯其庸与我父亲住在一个屋里，一下工就在那里埋头读书。他告诉我，他出身中农，从小就下地干活，都是白天务农，夜里躲在蚊帐里捧读，耕读是中国的传统。我父亲种的南瓜还让当地的老倭很惊讶，听见一位老倭问他：陈老师，您的南瓜为什么种得这么好啊，我父亲回答，多动脑子多看农业书就行了。后来五七干校被撤消后，他们在刘家站盖的一批房子竟成了当地的抢手货，因为质量特别好。

### 该学的不会 没用的都知道 扭曲的知识塞满一脑瓜

1971年，我们全家终于相继回到北京，又没多久，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进了人民中学读初一，进了学校才发现，我居然连小数点、汉语拼音都不会，错别字连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读书的好处，很快就赶上了，数学课拿到了90分以上，还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查字典，历史、地理、语文老师

都很喜欢我。这时，虽说还有考试，但考试不影响升学、无关毕业，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来不是当工人、入伍，就是下乡插队，所以没多少人听课。我们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学专心听讲，其他人都是在课堂上睡觉、聊天、瞎玩。

那时的老师很有水平，我就读的人民中学，后改为165中学，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是所教会学校，所以拥有不少一流的教师。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我刚进学校时她还戴着大口罩在扫地，因为被怀疑为日本特务，后来终于走上讲台，依然留着个“特嫌”的尾巴。历史老师时宗本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地理老师王守让则毕业于辅仁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读大学的老师读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但是，当时由于大学毕业的师资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经开始让中学毕业的学生教书，主要教政治和当辅导员，结果，我们学校发生过多起老师和高中学生谈恋爱的风波。

我在165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外语、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最后这两门新课程就是为了将来进工厂、下农村做准备的，后来的经历证明，基本没用。

语文课其实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课文都围绕着阶级斗争，有的课文实在难以称之为语文范文，只能说是合乎当时政治需要的阶级斗争范文。鲁迅是当时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经被形容得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了，所以，课本里必然会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文字，经过老师的解读，我们从中得到的是封建礼教吃人、反动势力一定要打倒这样的信息，从此也知道梁实秋、林语堂、杨荫榆都是反动派的帮凶。文言文虽说也被选入，但像《东郭先生》一类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课文里还有文革中的报刊文章，我记得选有一篇《杨水才》，因为杨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赞扬的，他的“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干革命”的豪言壮语是舆论宣传的。杨水才的事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结婚，只读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问中学历史老师在讲什么课，回答是从猿到人，他马上批评道，讲那些干嘛，还是讲讲咱们的“老三篇”。

外语课分英语和俄语，那个年代连中文课都没人听，如何上外语课？老师只好劝导大家，学英语是因为毛主席还在背英语单词，而学俄语是将来社会帝国主

义侵略我们时可以用得上。我们学的英语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一篇课文《半夜鸡叫》，里面别的没记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话：起来，干活去，你们这些懒鬼！人人都会。我们的英语老师姚景唐毕业于洛阳军事外语学院，教这些真是大材小用，记得他还教了一句缴枪不杀，我们也记住了，因为他说抗美援朝时，这句英语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儿”，教会了所有战士，从此同学互相打闹时都喊“葡萄糖一根儿”。

历史课就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运动，政治课则是10次路线斗争再加秋收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五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那个时代，10次路线斗争，人人了如指掌，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的基础知识。抗日战争，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抗战的主力则是共产党。少量的革命电影也逐渐被解禁，《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出现在电影院里，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对抗战的基本认识，至于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慰安妇，那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平型关大捷曾经是我们了解最详细的抗日战役，连被歼灭人数、被击毁车辆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后就隐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最响亮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而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自始至终响彻云霄。前些年，北京万寿路一家以鲍鱼闻名的餐馆，每天早晨员工培训的口号竟然也是这一句，足见这一口号早就渗透进我们的血液里。可以说，我们是在战备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拉练这个词，现在打开词典说是部队训练的一项内容，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当年经常离开学校、跑到郊区拉练，像士兵那样学会打背包、背背包，双腿肿痛、脚底磨泡，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为的是战争到来可以随时出征。比拉练更频繁的是在学校里挖防空洞，有一段时间每周下午都在那里挖掘，挖出的土就运到东单公园，我曾经多次跟车去公园卸土，如今公园里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们中学的防空洞与四周的防空洞还连成了一片。为了配合战备，政治课里增加了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的内容，这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此外我们还常去电影院观看教育片，内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夺我国领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里的战备教育让我们的战争意识深入骨髓，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许多人与我一样，在地震那一刻都以为是苏修扔原子弹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斗以外，境内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都是在境外朝鲜和越南进行的。而60多年来让中国大陆死伤惨重的一是大跃进、二是文革，还有就是大地震，几次大地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地震防备的基本教育，每次地震都让老百姓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

忆苦思甜是我们经常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忆苦，是让我们知道“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地主老财，无恶不作，贫苦人民忍饥挨饿，牛马不如；思甜，是让我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因此要感谢毛主席。我们吃过忆苦饭，那是由糠和烂菜叶子混合而成的窝窝，还听老工人、老贫农上台控诉旧社会，但每次控诉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动、也不感人，尽管大家口号震天，但除了几个特别爱表现的同学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无动于衷。尤其是忆苦饭，有的同学因为家境困苦，天天吃窝头加盐水，而且还吃不饱，所以也没觉得苦到哪里去。那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学就说还从来没吃过蜜呢。那时对外主要教育我们仇恨苏修、对内主要仇恨刘少奇和林彪，而刘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回到旧社会，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忆苦也是为了加深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儿罪恶的认识。

了解国际时事是我们在文革中的一种生活，身在西下洼、放眼全世界，是我们的座右铭，国际时事主要靠读报纸、听广播，再加老师上课得来的。那时我们对国际的了解虽说很偏狭，却特别细致，以至连世界上一些小国小党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们打倒了许多年，但后来的主要敌人又换成了苏修，全国所有舆论十几年中始终以苏修为靶子，三年困难时期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还债，而今在边境陈兵百万、觊觎我国领土、随时可能来犯，这些话语，我们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等，是我们必须背诵的历史知识。

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如今恐怕已经被人遗忘了，可那时却是我们最熟悉的，还一再成为考试的内容。多次游行都是为了这三国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

胡志明是我们尊敬的越南领袖，越南北方的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我们耳熟能详，甚至我们都知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临时共和政府领导人阮友寿、黄晋发、阮氏萍的名字，因为这些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

估计我们那代人对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经超过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红色高棉是我们多年坚持支援的对象，波尔布特、乔森潘是报纸和广播里天天歌颂的人物；当然还有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宾努首相，他们的见报率和周总理一样多，我们经常在电影院里跟着和蔼的“努克”、美丽的莫尼克、摇头晃脑的宾努周游全国各地，欣赏美景，吟诗作词，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们的行踪几乎都拍成了纪录片；先是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后是洪森、韩桑林，都成了我们打倒的对象，其实这些人长什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是随着报纸一起喊而已。

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富马亲王，当年念起这些名字，就和我们说邻居街坊一样熟悉；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大概澳大利亚都没几人知道，而我们中国人却最熟知，因为他每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接见，永远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朝鲜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但那时好像中朝关系不如中越显得那么热烈，只是每当中国来了政治运动，金日成都会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报上就读过他支持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来电。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封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的贺电还被谱成曲，旋律上口，人人会唱。地拉那，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改革开放以后我经常问外国人，回答都说不知道，而我们全国男女老少那时谁人不晓？霍查、谢胡，连国防部长巴卢库，在我们这里都如雷贯耳，后来，巴卢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我们都说他是阿尔巴尼亚的林彪。

中国当年拼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都曾与中国交恶，记得尼克松访华后，一位伯伯来我家串门说，阿尔巴尼亚开始公开批判中国，对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是全力攻击。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眼里，已经成了中国眼里的苏联。回想起来，当年的革命外交路线真是彻底失败，口号白喊了、援助白给了、仗白打了、人白牺牲了、歌也白唱了，原来养了一群白眼狼，我们受骗上当不说，还打肿脸充胖子，反不如以后的中美、中苏、中日关系，获得的

好处特别多。其实，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坚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用不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的。

我在中学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多学点理论，于是我就经常参加课外学习小组，读了一堆的马列原著，读过之后的感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读越对现实有怀疑，总觉得现在距离马克思主义太遥远。文革前期，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几乎没书，而图书馆长期被禁闭，文革后期，随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的运动，书店里开始出现一批所谓儒法斗争的书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则是为了学习，一律由工农兵大批判组注释，这让我读了不少书，买了不少书，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话注释，还是开卷有益。我家有位邻居曾文经是哲学系教师，忽然间门庭热闹起来，一个工厂的工人理论组每天一早就过来，说是和曾老师一起注释法家著作，可争吵声常常从窗户里传出，最后不欢而散。好在那时不是文革前期，社会没有那么严酷，他没有因此被批斗。

文革时期，我们获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报纸社论转引，二是中央文件，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经常集中起来倾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每项指示一出来，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语焉不详，颇费揣测。文革后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两股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一遇毛主席指示出来，周围的长辈都会在那里纷纷猜测，这是指谁的，那是批评谁的。例如“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几句我记得非常清楚，不仅老师、父母、邻居在议论，同学之间也在传小道消息。“走后门”在那个时代非常盛行，似乎干什么都会想到“走后门”，招工、当兵、逃避上山下乡，买紧俏商品，都有人“走后门”。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是当时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后门往里钻，还有人靠着顶替制度，让父母提前退休，然后自己顶替当工人。我哥哥高中毕业那年一门心思想入伍，我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找后门，可我家在部队实在没什么后门，只得作罢。

文革后期，除了8个样板戏外，终于出版了一些小说，还上映了一批新电影，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也有旧作新拍，浩然是那时最著名的作家。不过，包括8

个样板戏在内的所有新旧作品里，那时最鲜活最生动的形象几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语言也有味道，不那么干瘪生硬，让我们过目过耳不忘，如刁德一、胡传魁、鸠山、钱广、马小辫、松井、汤司令、胡汉三，还有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饰演的那个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读过的一部有史以来最差的小说叫《虹南作战史》，也诞生在那时的上海，后面署名是集体创作。电影《闪闪的红星》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儿童片，可现在看来，一个孩子又杀人又放火，实在是“儿童不宜”，不知为什么，这部影片时至今日竟然还在电视频道不断播出，说是爱国主义。对电影《决裂》，当时我已经心存疑惑。郭振清饰演的那个主角举着一个长满老茧的手说，有人讲上大学要有资格，看，这就是资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学？干脆办个农业小学岂不更省事！实际上，这也是我对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学为工农兵学员上课，他告诉我，有的学生连小学水平都不够，多数人必须从初中开始补起。于是我就发问：那这个大学又有什么意义？我也常想，大学毕业生甚至中学毕业生都被说成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那为什么不取消大学和中学，让大家直接当工农不就得了！何必费了那么大劲，将人培养成资产阶级，然后又费劲再来改造？

那时的外国电影就那么几部，观众都是来回欣赏，情节烂熟于心，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苹果的时候》中的女主角），特务老狐狸还有接头暗号“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见的战线》），印象最深；越南电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个跳大神的镜头，“天灵灵地灵灵”一直难忘。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水平最高，《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勇敢的人们》、《第八个是铜像》，让我们领略了欧洲电影的手法。这些电影今天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当时都比中国电影好看，朝鲜电影有爱情，苏联电影有生活，阿尔巴尼亚电影有情趣，所以，我们百看不厌。

看内部书、欣赏内部电影、去内部书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读过的内部书有《林肯传》、《拿破仑传》等，邻居王金陵是王昆仑的女儿，

人民大学语文系教师，她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特意送给我父亲一本，前面标明供批判用，我反复读了多遍。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联合舰队》等内部电影，谁如果有幸搞到一张票，就是荣耀，看过之后个个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没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什么仇恨，同学里还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风突击队，其中有位团干部将这种崇拜居然写进了思想汇报，在学校轰动一时。人民大学当时已经被撤销，我父亲当时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给我带回来各类禁书，还能开出内部购书介绍信，我时常手持介绍信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营业部看书、买书，一看就是半天，里面的几位店员都认识我，夸奖我会买书，物美价廉。我买了《于湖居士文集》、《苏东坡文集》、《经传释词》、《经籍纂诂》等，最高价2元5毛，最低价5毛，都是线装书，可惜那时我没多少钱，以浏览为主，不然可以拥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亲在北师大图书馆的同事中，有好几位是因历史问题而不准登上讲台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会三门、四门外语，所以被分配到图书馆做编目工作。一位姓贾的伯伯会英日俄德法西5门语言，被定为“特嫌”“有严重历史问题”，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语，我至今未忘。如今回忆起这几位老先生，很替他们遗憾，一肚子学问却长期不能教学生，算是白白耽误了。

文革从头到尾都是与教育过不去，与老师过不去，与考试过不去。开始是斗老师、打老师，学校长期无法正常上课，后来又不断地掀起事端，运动不停。从马振福公社中学事件、批判《园丁之歌》，到学黄帅反潮流、学张铁生交白卷、批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老师始终是靶子，而且总会拿考试开刀。后期的这些批判浪潮，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被要求写出批判文章，我在班里算个写手，又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所以，黑板报、广播稿和大字报没少写。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学校团委要求第二天必须贴出自己署名的大字报，我只得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不点名地批判我们的物理老师唐润和。唐老师没有历史问题，6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所以在那个课堂纪律十分混乱的年代，敢于站出来维护秩序，爱捣乱的同学们都怕他，而他对我们这些爱学习的学生却关怀有加，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因此，他的形象就成为我的批判对象。这张大字报让我后悔至今。

邓小平主政以后，整顿工业、交通秩序，遏制了文革以来长期存在的派性斗争，改变了许多地方和行业的混乱局面，社会生活趋于好转，这让当时的人们都对他心存感激，佩服他的能力。在他再次被打倒的前夕，有几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是对周荣鑫的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二是刘冰等人向毛泽东告发迟群、谢静宜，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矛头是对准他的，周围的邻居都说这两个人何德何能，居然能掌管中国最高学府，还是教育界和北京市的领导，无非就是近侍嘛；三是连《创业》《海霞》这样的影片都曾通不过，令我们感觉莫名其妙。

1975年11月下旬，因为刘冰等人的信而招致毛泽东的批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当时北京很多部门都在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其中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从此，社会上谣言四起，不满情绪日益明显，连我内心的反感也在增加。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毛在当时虽然被很多人无限崇拜，但这种崇拜像是符号，比较抽象，而人们对周的敬仰却很具体，他的形象、风度、气质、言谈、行事，几乎无人可比，尤其在知识分子当中，对周的钦佩是发自内心的。他的去世，让人们悲痛不已，在悲痛中又想起当时的政治情形，一种前途未卜的愁绪弥漫开来，于是，悲痛、不满、迷惘，形成了人们的冲动。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来，周围的邻居就开始酝酿戴黑箍，我听见后也要了一个，究竟戴不戴犹豫了一夜，次日上学时，我鼓足了勇气戴起黑箍走上街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带黑箍。大街上，当我看到一些人与我一样，也带着黑箍，心里便有了底气；到了学校，发现和我同样带黑箍的同学还有10来个，历史老师时宗本的臂上也有一个，更让我欣慰。

从那时起，我一步步走向醒悟。■

【以歌观史】

# 歌声中的暴力

马昌海



本期刊载的唐燕女士与顾土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一些老歌，如《哈瓦那的孩子》（带有探戈特色）；《阿瓦人民唱新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等。这些歌曲在网上都可以找到。顾土提到的《海内存知己》这首歌，是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1966年10月2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创作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革命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出自初唐四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文革前曾长期对青少年灌输阶级教育、仇恨教育和忠诚教育。如唐燕所言：狼奶的主要成分就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在此我们选了两段毛主席语录歌曲：

## 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79页）。

## 2. 《造反有理》——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12.21，载于《人民日报》1949.12.20）。

文革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就是以这些论述为宗旨，创作了文革中的第一首红卫兵造反歌曲《革命造反歌》：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以暴力推翻旧上层建筑的社会变革。农民造反改朝换代当然不是革命，革命也绝不能仅仅归结于单纯的暴力手段。只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才能称之为社会革命。但剧烈的暴力往往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动乱和极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了武化大革命。与之相伴随的，是“血统论”毒液的喷发。

实践证明，鼓吹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消除贫富分化，以暴力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废除私有制和私人经济，反而造成了某些破坏民主法制、践踏人权、摧残人性的灾难，对社会先进生产力破坏的恶果有目共睹。而一些国家在健全法制、不排斥良性自由竞争的基础上，用改良的方式解决贫富差别问题，却往往成本低、代价小，效果也不错。

在文革中，红卫兵组织取代了中学的共青团，红小兵组织取代了少先队。有关红卫兵和红小兵的歌曲都很多，本期选了两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代表性的，具有明显语言暴力倾向的歌曲。

#### 1、《红小兵越战越坚强》——

红小兵，气昂昂，满腔怒火上战场，为了参加大批判，戳穿林贼黑心肠。阶级斗争天天讲。反修防修永不忘，毛泽东思想来指引，红小兵越战越坚强。

#### 2、《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

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鬼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嘿！ ■



## 【资 料】

**戳穿党内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狼狈为奸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军工红色造反团 遵义兵团、红宝剑战斗队**

我院反动“学术权威”的总代表曹鹤荪，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握股票拿定息的资本家，美帝，苏修的忠实奴才，两次加入国民党的特别党员，旧交大的训导长。解放后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疯狂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惜手段的包庇下，这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却钻进了革命队伍，摇身一变，竟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军工副院长这么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头面人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

我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刘居英之流，为达到在军工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刘居英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凭着他特有的反革命嗅觉，一眼就选中了曹鹤荪这条大毒蛇。他如获无价之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肉麻地吹捧曹为“仅次于钱学森的力学专家”，“权威中的权威”。并随心所欲地破格提拔重用曹鹤荪，使之青云直上，一步登天，窃居了人大代表、副院长等要职。刘居英之流还一再为曹涂上“思想进步，历史清楚”的保护色，把这条大毒蛇乔装打扮为美女，作为自己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罪恶活动的高参。“王八瞅绿豆对上了眼”，曹鹤荪也为在党内找到刘居英这样的代言人而拍手叫好。“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出于进行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

个目的，刘居英与曹鹤荪两相情愿，一勾一搭，一唱一合，共同篡夺了军工大权，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社会主义的学院，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把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事工程学院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温床。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党内走资派刘居英与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互相勾结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将他们批倒斗臭，让他们这出复辟资本主义的双簧戏去见鬼吧！

### 一、曹鹤荪“装死躺下”，“窥测方向”；走资派“护曹过关”，“给曹镀金”。

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按捺不住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早在解放初在上海交大就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残酷无情”，“刻薄毒辣”，曾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他对此怀恨在心，百般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剥他的皮”，“洗他的脑筋”。而且还居心险恶地说：“我过去到过许多国家，在那些国家里我很快就习惯了。解放后我觉得反而比在外国还难受。我讨厌开共产党的会，讨厌听他们的报告，”看，曹鹤荪的反动立场是何等的顽固！曹鹤荪来到军工以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曹鹤荪就是这样“装死躺下”，夹起了反革命的狐狸尾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初来军工，步步设防，事事小心，少开会，少交朋友”。但是，狐狸的尾巴是不能长久隐藏住的，他“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当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曹鹤荪反革命活动时，党内走资派刘居英就亲自出马为其开脱罪责，胡说什么“一个人说点话，就受到迎头批评，谁还敢说话了？”也还是他，罪该万死的刘居英，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不择手段地包庇曹鹤荪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安然无恙。请看！当

年审查曹历史的肃反小组由“教授协会”领导，反动教授任组长，教授、副教授任组员。由这些人去进行工作，还有啥反可肃的呢！最后，刘居英之流下结论为“曹的历史已搞清，记入档案即可。”曹的狐群狗党还为他定下“消除疑点，给予信任”的调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走资派刘居英与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究竟什么关系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刘居英做贼心虚，唯恐自己的反革命勾当被人发觉，他就进一步加紧勾结，利用一切机会给曹镀金，掩人耳目。曹鹤荪受宠若惊，献媚献计，说什么“今后想在学校里教书，或做些事情，非贴上苏联的标签不可。因为不是苏联的，必然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计正合苏修奴才刘居英之意，于是下令学起俄文来。曹鹤荪被吹捧为“好学上进的教授”，并被提升为院教务处长。苏联顾问团来我院后，曹又被刘居英指名为向苏联专家学习和接班的赫赫有名的人物。曹鹤荪与苏修臭味相投，皆是一路货色，如出一辙。他与苏修顾问一唱一合，声嘶力竭地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反对毛主席关于“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口号，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污蔑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保姆式的抱着走”。真是反动透顶，疯狂已极！曹鹤荪追随苏修，肆无忌惮地攻击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博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居英的赞赏，刘居英特地带着他去苏、波、捷等国参观。为了达到此卑鄙无耻的目的，刘居英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采用偷天换日的手段为曹在出国登记表上填了“思想进步”四个大字，并亲自任命曹为参观团秘书。真是混蛋透顶，令人发指！

## 二、曹鹤荪杀气腾腾，反攻倒算；走资派助威打气，后台撑腰

1958年，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响应毛主席的“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伟大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群众性教育大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眼看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即将破产，他怎能不作垂死挣扎？他不仅置之度外，对教育大革命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且采取“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毫不掩饰地向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进攻，抛出了一张臭名昭著的大字报《为生产一千台拖拉机算一笔账》。它用最恶毒的语言

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反对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全面否定勤工俭学的显著成绩，是一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大毒草，是反革命的代表作。“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敢同魔鬼争高低，不向霸王让寸分，大家义愤填膺地向曹鹤荪猛烈开火！正当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面临灭顶之灾的严重时刻，党内走资派刘居英又一次赤膊上阵，为曹开脱，胡说什么：“专家算细账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好一个“实事求是的精神”，照此办理，我们的国家改变了颜色，我们的脑袋落地，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1960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主持了中央军委工作，并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共中央批示中明确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居英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加以全面篡改，分庭抗礼，搞了个“决议的决议”。并紧跟其黑主子刘少奇、陆定一之流，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高教六十条》视若神明，捧为圣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结合我院的情况，搞了个《八十条》。制定大毒草《八十条》的罪魁祸首就是张文峯和曹鹤荪！他们给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大毒草《八十条》刚一出笼，刘居英就赶紧写信给张文峯说：“‘草案’两字可取消。党支部性质和任务不如照抄六十条。我改了一下，请专家再改一下”这句话一下子就道破了刘居英的狼子野心，这个所谓“共产党员”的身上哪有一点起码的无产阶级觉悟！他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至连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也让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来修改一下。

走资派刘居英之流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野心，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为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处心积虑地要把军工办成万人大学，办成不低于国内“重点”大学水平的拔尖学院。曹鹤荪心花怒放，兴致勃勃，立即兜售一整套资本主义黑货，献出旧交大“基础雄厚”、“把三关”的法宝，大批淘汰工农子弟。请看以下惊心动魄的数字吧：

1962年暑假考试，全院不及格人数占全院参加考试人数的48.2%，全院不

及格人次竟达 5493 人次！8 月份补考时，又有 1356 人不及格！结果被处理退学的达 646 人，被处理留级的达 573 人。其中绝大多数同志是工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女和革命军人子女。

这一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刘居英和曹鹤荪一手策划的。事前，曹鹤荪对刘居英说：“把这些学生留在学校，会影响军工的牌子，不如泻掉好。”他还献计说：“要实现泻，只要把题目出得难一点就行了。”也还是这个混蛋，下密令，把“中等水平的学员经过努力可达及格”作为评分标准。刘居英和曹鹤荪之流制造骇人听闻的“泻大肚子”事件，残酷迫害工农子弟，其用心何等毒辣啊！这是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向工农子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铁证之一！这样的例子还举不胜举。

刘居英和曹鹤荪之流一方面迫害广大工农子弟，一方面又在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曹鹤荪多次讲：“学院的主要困难是教师队伍不强，师资不足。解决的办法只有抓教师进修，多搞理论研究。”刘居英讨好曹鹤荪说：“在这方面曹副部长是内行。”令人作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走资派刘居英之流反其道而行之，念念不忘向反动“学术权威”学习。曹鹤荪之流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把许多充满革命朝气的青年引上了邪路，甚至走上反革命道路。由于曹鹤荪之流大肆散布只专不红、技术第一等反动谬论的结果，使我院一部分青年在一个阶段中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青年前进的道路。当这部分同志回顾所走过的弯路时，难过得流下了热泪。这笔账应当记在刘居英、曹鹤荪之流身上！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 **三、曹鹤荪赤膊上阵，公开篡权；走资派送货上门，拱手交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刘居英为有曹鹤荪这样复辟资本主义的高参而得意忘形，常夸口于众，胡说什么：“曹鹤荪是一、二十年的老交大教务长。我们有了这个人，不怕办不好学

院。”真他妈的反动已极！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刘居英闭口不谈党委的领导，而把办好学院的希望全部寄予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身上，不难看出，他们究竟要办个什么样的学院，不是图未穷而匕首见了吗！

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在所谓的“老教师交心会”上射出一百八十多支毒箭，向党和毛主席疯狂进攻。刘居英还为他火上加油，向他提供弹药，为他打气助威，竟然说什么“这是真正向党交心”，是什么“后来居上的标兵”，还公开号召党团员向这些右派学习。刘居英对曹鹤荪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以至于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别出心裁地命令“党支部要保证曹每月增加一斤体重”。在1960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刘居英不顾中央的指示，亲自率领80多个“学术权威”，坐上软席卧铺去长春、吉林“仙游”。住高级旅馆，吃山珍海味，任意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还美其名曰“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学习”。1961年刘居英又把这群牛鬼蛇神请到大和旅馆，大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神仙会”活动。

曹鹤荪念念不忘“权”，他一贯大搞篡权的罪恶勾当。早在1958年，刚由教务处长提升为教务部副部长的曹鹤荪歇斯底里地狂叫：“有职无权。”“权威”动怒，走资派忙应酬。戈果等人闻讯后连夜开会专门研究，他们毫不掩饰地对曹说：“在你分工的范围内，大胆负责处理问题吧！”那里知道吃力不讨好，更加激怒了曹鹤荪。曹假情假意地宣称：“副部长太多了，我今后希望教教书，少管行政工作。”狗头军师要“打”退堂鼓，这下子可吓坏了刘居英之流。他们坐卧不安，心神不宁。于是赶紧采取特别紧急措施，让曹参加党的教学工作会议，将全院所有绝密专业都向曹开大门。曹以“领导者”和“权威”身份出场，参与审查专业设置、专业教育计划的讨论，曹的意见成为党委会决定中的灵魂。曹鹤荪还乘机得寸进尺，一举篡夺了我院教育计划制定、审批，教师进修，任免、提拔，学生升留级等项大权。

刘居英之流还嫌拱手拱得不够，就在他的黑主子——国防科委党内走资派张爱萍的指使下，要把曹强行拉入党内。而且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精心考虑了两位介绍人：张文峯和戈果，找谈话，作自传，忙得不亦乐乎。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心最红，眼最亮，他们识破了刘居英之流的阴谋

诡计，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起来造反，坚决抵制刘居英之流的卑鄙活动。迫于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刘居英之流不得不结束他的美梦。

就是这样，曹鹤荪之流完全篡夺了军工的大权。把毛主席亲自缔造的红彤彤的军工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场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了在学院的统治，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同流合污，不择手段地与我们伟大的党争夺年青一代，企图把千万个青年培养成修正主义的苗子。

这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啊！这是多么激烈、复杂、长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殊死决战啊！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走资派刘居英之流被打翻在地，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之流被剥去画皮，现出原形。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狼狈为奸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我们粉碎了。红色革命政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迎着东北的新曙光，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光荣地诞生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军工学院迎风飘扬，高高飘扬！

我们一定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宜将剩勇追穷寇，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斗臭，肃清他们的流毒！为把军工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

摘自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革命办公室

《教育革命》第10期 1968.4.12

## 【资料】

## 最高指示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 是“超政治”的教授，还是美蒋反动派的走狗

## ——剥掉曹鹤荪的几张画皮

## 军工红色造反团 《红宝剑》战斗队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地历史地看一个人，不可只看一时一事。对曹鹤荪也应当这样。

曹鹤荪是什么人？长期以来，在我院是有争论的。广大革命的师生员工认为曹鹤荪是我院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刘居英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则认为曹鹤荪是“经验丰富”、“业务熟悉”、“有一定组织计划工作能力”的“交大廿年的老教务长”、“名教授”。他们说曹鹤荪“过去在学校主要还是搞学术的”、“在学术上能够钻研，在学校中有一定威信”。说他的“政治历史已经查清，应取消其疑点，予以信任。”因此，曹鹤荪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教务处长到教务部副部长，体改时又一跃为副院长，可谓“破格提拔”到了关键岗位，实际上掌握了我院的教育行政大权。1962年居然还当上了院的积极分子。他们还把曹鹤荪拉入军内，当上了人民解放军的“上校”高级军官。甚至以欺骗手段给他弄到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头衔，不可谓不“红”矣！

曹鹤荪自己呢？说他在解放前是“清高”的，“超政治”的，认为“君子群而不党是千真万确的名言”，是不屑于和那些“靠党吃饭”的国民党党棍政客们为伍的。

其实，这些都是假象。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对曹鹤荪应当剥去假面，揭露真相。不能让他再继续欺骗和蒙蔽群众。我们看到了曹鹤荪在1955年写的一份《自传》，发现这份《自传》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他“给人以假相，而将其真相隐蔽着。”一方面，他为自己制造了许多假面具，妄图掩藏他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却仍然不断地露出他的狐狸尾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现将曹鹤荪的这篇“奇文”拿出来放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让我们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货色！

### 一、曹鹤荪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解放以前，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曹鹤荪是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还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是个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呢？曹鹤荪用自己的历史写下了这个答案，任何假面具都不能掩盖其真实的反革命面目。

曹鹤荪出身“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封建地主阶级家庭。在抗日战争前，他家一直出租田地，出租店房。家里还用着丫环，过着不劳而食的剥削生活。曹鹤荪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思想上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种下了封建主义的坏根。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蒋介石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出身地主阶级的曹鹤荪一九三四年从交大毕业后，便投靠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站在反动派一边了。第一步，他就跨到上海一家英商“开灵达洋行”去替英帝国主义剥削和压榨中国的同胞“效劳”，甘心充当英帝的一个小洋奴。这时，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日寇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的这个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反动政权，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要在中国实现其法西斯统治，所以便与墨索里尼相勾结，作了一笔卖国交易，准备在南昌建立一个中意飞机制造公司，建立蒋匪空军。因此他就需要收买一批为他忠实服务的有知识的奴才，故以伪教育部的名义代伪航空委员会招考一批大学毕业生去意大利学习航空工程。曹鹤荪从其地主家庭的立场出发，便本能地又投靠到蒋介石的

卵翼之下。他报名应考被录取派往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以后又到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去“留洋”。他对德意法西斯崇拜得五体投地，说什么“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政治独裁有它特别的好处。”曹鹤荪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信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曹鹤荪被调回国。他在意大利本来只是研究院毕业，并没有得到博士学位。但他却冒充“意大利都灵大学博士”招摇撞骗，一直到解放后肃反时才被揭穿，所谓“学术权威”原来是一个冒牌的假博士。

曹鹤荪回国后，就被派往蒋介石亲任校长的成都航空机械学校任高级教官兼基本学术组和编译组的组长，主编“航空月刊”，为蒋匪空军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鲁迅说过：“凡是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曹鹤荪这个帝国主义的洋奴，虽然为意大利法西斯所豢养，但对美帝国主义也同样的驯良，以能到美国去为光荣。所以他在1944年又通过国民党航空建设协会的头子及海外部长的关系，为了加强蒋匪空军的建设，而被派到美国和加拿大去考察航空事业。曹鹤荪到美国后，在为“效忠”蒋介石的“党国”而奔走的同时，也为美国的花花世界所陶醉。他上舞厅，跑交易所。在交易所赚了一笔美金，饱囊而归。回来又在“冒险家的乐园”——大上海买了股票，直到公私合营后还拿取定息，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他的老婆也是拿取定息的资本家教授的女儿，所以曹鹤荪是个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

曹鹤荪对失去的“天堂”无限留恋，对美英德意帝国主义无限感戴，对人民公敌蒋介石一片忠心，他的这种感情除了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以外，从他在解放后所保存的一百五十六枚钱币这件事上也可看出来。这156枚钱币包括中外古今，有美英法的，也有带“卐”的德意法西斯的。中国的有大清帝国的，伪满洲国的，而大量的则是带着“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的蒋介石的“法币”。这不是普通的几枚钱币，而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对封建皇朝的怀念，象征着他对德意英美帝国主义的向往，象征着他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忠诚，象征着他对失去的“天堂”的留恋。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曹鹤荪是不仅在口

头上而且行动上都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的完全的反革命派。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分子，冒充博士的“权威”，德意法西斯主义的信徒，美英帝国主义的洋奴，蒋介石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不管他披着什么画皮，都是掩藏不住他的狰狞面目的。

## 二、驳所谓“君子群而不党”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曹鹤荪为了掩盖他追随国民党反动派所干的反动勾当，采取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给自己披上了一张画皮，说什么他认为“君子群而不党是千真万确的名言”。说他是“靠读书吃饭”的，他鄙视那些“靠党吃饭”的人，藉以表明他和国民党的反动政客和御用文人不是同流合污的。

果真如此吗？完全不是。“君子群而不党”的曹鹤荪，不仅加入了国民党，而且是两次加入国民党的双料国民党员，而且不是国民党的一般党员，是国民党的“特别党员”。

曹鹤荪第一次参加国民党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当时他是伪航空机械学校的高级教官。他和“机校”其他伪军官在一起，按单位列队站立，由教育长率领举右手宣读誓词，加入了国民党，按月缴纳党费，每星期参加“总理纪念周”。但是他在《自传》中却胡说什么“我没经过入党手续，没有填过表，没有拿到过党证，没有经过入党宣誓。”所以是“不算数”的。就是这个“不算数”的国民党员，到交通大学以后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生活，选举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和书记，而且接连三次代理只有国民党骨干才能担任的交通大学训导长。

曹鹤荪第二次参加国民党是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的时候。因为曹鹤荪这个披着教授外衣的“训导长”反动有“功”，所以一般的受训人员是由分队长、中队长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而曹则受到特别重视，由国民党中央常委“AB团”的头子，“中训团”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段锡朋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这次他便拿到“特字××号”的党证，成为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并马上被选为筹建交通大学三青团团部的负责人。最近他自供：“我在中训团受训时，有人找我负责筹备交大三青团的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受训的时期内，小队指导员曾经找我谈过两次话，他主要是了解我的经历，我把我代理训导长等事情都告

诉了他。”在中训团受训之后，“三青团中央团部就给交大一个公事，叫李熙谋（伪交大教务长，特务，已逃往台湾）和我筹备组织交大三青团团部。”“在交大三青团团部报告筹备和成立经过的公文上…我同意盖了章”。可是他在《自传》中却说：“我没有参加过这个工作，只是李熙谋一个人去筹备的。……我所以不加入三青团的原因，在我还有自命清高的思想，不愿混进这种政治团体。”真是狡猾已极。

忠实于蒋介石的曹鹤荪看准了国民党的 C.C 派这个法西斯组织，最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利益。所以在他加入国民党之后，在重庆时，因为 C.C 头子陈立夫当伪教育部长，交大校长吴宝丰也是 C.C 的亲信，所以曹便依靠 C.C 派，拉起了山头。他自供：“发展到有把持学校的样子，我曾经和其他教授一起赶走过训导长马绍伯，潘廷干，教务长陈章，总务长杨立惠，陈湖，张锡荣。”曹鹤荪飞扬跋扈，有权有势，当上了航空系主任，代教务长和训导长，并被派到美国“考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局长朱家骅当了伪教育部长，吴宝丰因镇压学生运动软弱无能而被蒋介石大骂一顿后被迫辞职。曹鹤荪“效忠党国”不甘“落后”，便又与李熙谋、王之卓（朱家骅派往交大的亲信，后为交大校长）相勾结，以朱家骅为后台，以重庆来的年轻教师为基础拉起了“少壮派”。因为李熙谋原是交大教务长，又是上海伪教育局副局长，国民党交大区党部书记，交大的反动力量都控制在他手里。而王之卓这个人正如曹自供的，他“有野心，有中英庚款这个班底，有朱家骅的后台，……王之卓到交大后，他在交大是没有基础的，他也希望利用我在交大的影响。”所以就以李熙谋、王之卓、曹鹤荪等为核心结成了“少壮派”与所谓“元老派”展开了争夺以交大领导权为中心的狗咬狗的斗争，结果“少壮派”大获全胜，攫取了交大的全部要职。王之卓当了校长，曹鹤荪爬上了交大教务长兼教授会主席的“宝座”，成了交大的第二号人物。与李熙谋、王之卓并称为交大“三巨头”。1949年曹鹤荪以交大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上海“大教联”并“晋京请愿”成为代总统的座上客，真是喧赫一时的“人物”。

由此可见，曹鹤荪之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不过是“不党”共产党的党，对国民党却从来不敢说半个“不”字。他是一个唯国民党之命是从，趋炎附势，善

于玩弄权术，搞宗派斗争的伪君子。“君子群而不党”不过是他挂出来的一个羊头而已。

### 三、驳所谓“超政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举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在中国也是如此。一面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一面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打着白旗的国民党。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可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掩盖他们反动的剥削阶级本质，总是打起。“超阶级”、“超政治”的幌子，以此来欺骗和愚弄广大群众。曹鹤荪在《自传》中自称是“死读书，不问政治的‘超政治’。”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披着“教授”外衣搞反革命的老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而蒋介石则在美帝的唆使下，不但不反击日寇侵略，反而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妄想一举消灭共产党，实现法西斯统治。一九三四年，蒋介石与墨索里尼勾结建立蒋匪空军。此时，曹鹤荪等在被派往意大利留学之前，曾在南昌受到军政训练。意大利“总顾问”向他们灌输法西斯思想，人民公敌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要他们到外国“好好学习”，赐给他们每人一张蒋贼狗头照片。曹鹤荪等到达意大利后受到特别“优待”，一名意大利空军上尉专门陪同他们参观游览，甚至连空军指挥系统也让他们参观了。尤其要指出的是，曹鹤荪等在途经罗马时，法西斯创始人墨索里尼接见了他们，并给他们“训话”。可是，曹鹤荪的《自传》却对这段反动历史只字不提。在意大利，蒋匪特派大特务头子、复兴社（兰衣社）的发起人邓文仪到他们那儿去，要发展他们加入反动透顶的特务组织复兴社。曹鹤荪还单独去过巴黎和柏林。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才“奉调”回国。不难看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完全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忠实信徒。

在抗日战争时期，曹鹤荪从1937年至1940年在蒋介石亲兼校长的伪航空机械学校任高级教官，直接为蒋匪中央军服务。但他却花言巧语地说什么“这种学校是反动的，但在当时我一点都看不出来。”真是自欺欺人！一九四〇年，正当大批爱国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之时，曹鹤荪却乘替“机校”招生之机会溜到蒋介石“陪都”重庆，在交通大学任“教授”。可是“机校”不放他，对交大说：“该员为本会资遣留意（大利）人员，值效空军需人殷切之时，不容久任外职。”交大却拉曹不放，说：“曹教授为本校所器重”。双方为此事竟打了两年官司，后来经国民党 C. C 派反动头子、伪教育部长、第六号战犯陈立夫和国民党参谋长、国防部长、第四号战犯何应钦写信给国民党空军司令、伪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说情，才允许交大“继续供调两年”。为什么一个曹鹤荪，交大竟搬动了陈立夫、何应钦之流呢？树有根，水有源。这是因为曹鹤荪曾在伪教育部召开的“训导会议”上介绍他的“经验”：“如果有一个业务上过得硬、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的教师兼任训导长，这样的训导长就比较好做。”曹的这一“经验”颇为陈立夫所称赞，就把他由“教授”升为了训导长。曹鹤荪究竟要给学生“训”些什么，“导”向何方，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一九四三年十月，曹鹤荪“自愿”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27期去受训。这一期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举办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逢星期日都要去主持“纪念日”，并亲自给学员训话讲课。反动头目陈立夫、吴稚晖、梁寒操等都任“讲师”，给他们作“报告”。在毕业时，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赖，蒋介石赐给他们每人一张亲笔签名的狗头照片，赠给纪念章一枚。在那里，曹鹤荪的思想确有很大的“提高”，他到交大以后毫不掩饰地对学生说：“共产党就是杀人放火的”，什么“抗战之所以不能胜利，原因是共产党牵后腿，耗费了蒋的一大部分军队，不能去抵抗日兵”，真他妈的反动透顶，无可复加！他还肉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廉洁的，只不过他手下的人腐败”等，称赞“国民党政策真英明，他们提出来要用政治来解决国共问题”等。曹鹤荪在为什么人效劳，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根本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他是有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的。他的立场是这样地鲜明：对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国民党忠心耿耿，是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而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则是桀骜顽劣，誓不两立。

曹鹤荪在“中训团”毕业后，身价升高十倍，更为国民党反动派所重用。为

了加强蒋匪空军的建设，他曾以伪航空建设协会考察团员的名义到美国和加拿大去“考察”。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曹鹤荪从重庆回到上海“接收”上海伪交大。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伪交大，是上海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国共两党在交大的斗争异常激烈。当时，以李熙谋、王之卓、曹鹤荪为核心的“少壮派”完全站在反动派一边，血腥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李熙谋这个国民党特务，由于做的太露骨了，遭到革命学生的强烈反对，不得不退居幕后。而曹鹤荪用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从事反革命勾当，欺骗蒙蔽了一部分群众，因此就成了旧交大反动派的核心人物。以曹鹤荪为主任的航空系成了反动势力的一个顽固堡垒，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曹鹤荪以“加重功课”的反革命策略束缚革命学生的手脚，破坏革命的学生运动。他还公开宣扬“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退出学校，学生就能安心读书，学校也不卷入浪潮了”。其用心是何等的毒辣！他并不是叫学生“安心读书”，也不是叫“学校也不卷入浪潮”，而是要叫学生脱离政治，闭门读书，不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根本不是让国民党退出学校，而是在维持国民党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不仅如此，曹鹤荪还直接参与了迫害革命学生的反革命勾当。他与反动的军警、宪兵、特务相勾结，开黑名单、逮捕进步学生。仅是一九四七年初，他就记过118名进步学生的黑名单；同年五月又开除、逮捕进步学生18名；八月又开除了12名。事实雄辩地证明，曹鹤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得力干将，是一个双手沾满革命学生鲜血的刽子手，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分子！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阶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美蒋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曹鹤荪此时爬上交大教务长的职位，成了交大的实力派。他迫于形势，也日益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甚至不择手段乔装打扮成“第三条路线”的样子，以“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左一个“通电”，右一个“呼吁”，和国民党一唱一合，同流合污。例如，蒋匪需要乞求“美援”，曹鹤荪等立即以上海各大专学校“教授”的名义联名致电杜鲁门与马歇尔，请求美帝把“援助”日本的物质“援助”国民党反动派。又如一九四九年元旦时，蒋匪发表“求和”声明，接着李宗仁出任代

总统，玩弄和平骗局，曹鹤荪就以教授会主席的资格，串通一些“教授”，连续两次发表“呼吁书”和“告全国人民书”，表示拥护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和共产党讲和。因为曹鹤荪是以“教授”的名义发表的，具有极大的欺骗和蒙蔽作用，起到国民党反动派所起不到的作用。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这些人“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正当“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刻，曹鹤荪以关心教职员福利为名，出来“应变”了。他以上海大专教授联谊会代表的身份“晋京（南京）请愿”，“谒见伪代总统李宗仁”，陈述苦情，“李代总统极表同情”，当即拨给所谓“应变费”伪金圆券十亿元，作为对曹鹤荪等最后一笔赏款。“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曹鹤荪直接追随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生涯也“结束”了。他贼心不死，还企图阴谋把交大迁往台湾。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曹鹤荪在解放后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他混入革命队伍，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相勾结，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真是罪恶累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鲁迅说过：“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虽然曹鹤荪的反动历史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清，但从已经知道的极不完全的材料可以看出，曹鹤荪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美蒋忠实走狗，反动“学术权威”。正如解放初期我接管交大的军代表同志所一针见血指出的“他是一个‘死硬派’。”

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曹鹤荪的丧钟，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曹鹤荪及其黑后台——我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刘居英之流，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揪了出来，剥去了他们的伪装，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出了原形。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的一切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他的一切流毒必须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战胜一切困难，誓把军事工程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千秋万代，永远永远在军工学院高高飘扬！■

摘自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革命办公室

《教育革命》第10期 1968.4.12

**【资 料】**

**愤怒控诉反革命分子吴鸿钧疯狂攻击毛主席，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四系 402 教研室全体同志**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反革命分子，大右派吴鸿钧，就是一个混进革命教师队伍，长期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并书写反动标语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拿枪的敌人。

吴鸿钧，生于1928年，1949年6月毕业于伪国立厦门大学电机系，1954年由南京工学院调来我院任教。曾任原一系四科教研室讲师，教学小组长，四系406教研室副主任，402教研室副教授等职。

自解放以来，反革命分子吴鸿钧始终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一贯抗拒思想改造，处处与人民为敌。

（一）反革命分子吴鸿钧狗胆包天，竟敢书写反动标语，侮辱，谩骂我们伟

大的领袖毛主席。

1966年9月，红卫兵从他的家中，搜出其保存的“民主日记”一本，在日记本扉页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像旁，吴鸿钧用钢笔写有六个大字“老子天下第一”，猖狂地侮辱我们伟大的领袖。此外，据揭发吴鸿钧在家中还多次散布过类似的反动言论，如“毛泽东天下第一，吴鸿钧天下第二，吴敬东（其子）天下第三”等等。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吴为了发泄对此次运动的仇恨和革命群众对其帮助教育的不满，攻击群众开学习会是：“下午又要开会了，听他们自己骂自己吧！”并胆敢在1955年27号活页文选“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的末尾，用钢笔写下“赤毛的笔尖，是否太粗”的反动词句，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共产党和伟大的肃反斗争。真是猖狂已极，反动透顶！吴鸿钧上述罪恶，铁证如山。

林副主席反复教导我们：“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新阶段。”“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的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反革命分子吴鸿钧如此随心所欲地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万万个不答应！

（二）吴鸿钧书写反动标语，决不是偶然的，他的反动思想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可以说，从解放到现在19年来，他是一贯地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攻击历次政治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动分子。例如：

（1）他多次谩骂其家属服从组织分配是“奴才思想”，公开叫嚣不服从分配是“应有的思想自由”。并借其家属写思想检查之机，咒骂我们党说：“共产党太厉害了，叫你自己写检查，让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你不能上人家的当！”

（2）1957年反右斗争时，吴鸿钧见势不妙，假装有病，去大连疗养，逃避了这场斗争。但他贼心不死，仍从外地写信给教研室某教员进行煽动说：“这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运动”，“我对此次运动抱有很大希望，我相信这一运动将

结束我们小媳妇般的生活，到那时，我们的工作将方便得多了！”。这是多么露骨，多么典型的右派言论！

（3）吴鸿钧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否认党对农民生活的关心，他说：“为人民？真正的贫苦农民饿死了，他们倒不管！”又恶毒地说：“油哪里去了呢？米哪里去了呢？还不是出口太多，拿人民的钱做好人”。1962年搬家时，发现他浪费的一小口袋生霉的馒头，糖三角，当某同志批评他时，他借机讽刺攻击说：“我这是响应哈市号召，留下备战备荒的嘛！”真他妈的反动已极，混蛋透顶！

（4）反革命分子吴鸿钧，猖狂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修斗争，他表示同意叛徒赫鲁晓夫臭名昭著的布加勒斯特演说，他十分欣赏苏修观点，说：“苏联知识分子政策很好”“全民党全民国家是反宗派主义的，有它的民主，有它的优点”，更恶毒的是，他胆敢攻击我党反修文章，说：“我党的反修文章语言太粗暴，太自以为是”，并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是“宗派主义，不民主”。一次，有人问他，“如果帝国主义打进来，我就上山打游击，你去不去？”吴鸿钧轻蔑地回答：“我没有这个兴趣”。这个反革命分子投靠美帝，苏修的卑鄙心理，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5）坚持反动立场的吴鸿钧，对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怀有刻骨仇恨。他抗拒思想改造，一贯散布反动言论，攻击知识分子政策。他说：“现在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利用’就是嘴里叫你教授、教授，喊着尊师重道，好使你服服贴贴给他们工作，培养学生，助教。培养好了别人，你有什么不对，就一脚把你踢开。‘限制’就是说教员没有学习和受培养的权利。”同时，还恶毒地说：“现在提到知识分子很臭，强调团结，意味着你是统战对象，给你买黄豆、关烟，吃到肚子里也消化不了”还多次说：“我要不是有这点本事，他们早就把我踢开了”。一次他参加省政协会议回来后，得意洋洋，凶相毕露地说：“现在，他们用得着我们了，又来拍我的马屁了！”同志们，吴鸿钧对党是什么感情，不是很清楚了吗？

（6）1960年教改时，吴鸿钧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他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大记变天账，他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斗了我99天，开了我108次会”。“×××（指教改积极分子）我一辈子也记得他”。为了发泄对革命师生的仇恨，他写了一首反动的咒骂革命群众的黑诗：

“悔授门下三千崽，枉负胸中十万兵”。同志们，这是多么地恶毒，多么地疯狂啊！

(7) 1965年教改时，吴不但不对其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检查，反而借机进行挑拨离间，煽动群众对教改的不满，××同志受到批评有些想不通，他就说：“××工作最辛苦，但意见也最多”并说：“×××一言不发，不也是过去了吗？”企图煽动抵制教改的情绪，其手段何其毒也。

(8) 吴鸿钧敌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天天开会，天天讲政治，听了都心烦、头疼”。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就赶忙换电台，说，“听那些，心里不好受，不如听日本音乐，情调轻松。”

(9)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吴鸿钧仍然十分猖狂。

运动开始，有人问他开会学习什么，他讽刺地回答：“不外乎抽烟，喝水呗！”

当群众发动起来，勒令其写检查，打扫卫生时，他竟然污蔑群众是“违反了政策”，无耻地声称“自己应该是属于受保护的人”，并扬言“要誓死捍卫十六条”来威胁群众。以后，他又把群众揭发他的情况，偷偷用铅笔记在小本上，准备反攻倒算。他一直抗拒群众的勒令，不进行检查交待，不来打扫卫生，逍遥自在，直到去年十一月，教育革命风暴到来时，还从他家中翻出了反动黑诗，偷窃的军用望远镜，仪器、计算尺，图书，本子等大批物品。

同志们，以上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吴鸿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大右派，是一个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吴鸿钧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中的一个！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主席是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纵使蓝天做纸，大海做墨，写不尽；高山做鼓，江河做琴，唱不完。吴鸿钧这样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一定要斗倒斗臭这个反革命分子，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就要和他血战到底，坚决、彻底，毫不留情地消灭他！我们就是要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三）吴鸿钧这个反革命分子还竭力反对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来培养学员，他不止一次地散布反动透顶的谬论：“三个忠于（即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是高标准，五条是更高的标准。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看问题，我们要培养的是大学毕业生！”

他明目张胆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说什么：“有人说业务冲击了政治，我看是互相冲击，在大小上是业务冲击了政治，在多少上是政治冲击了业务，回想一下，‘六分之五’（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居英泡制的臭名昭著的‘两道命令’中的一条，即业务学习时间要占六分之五）保证了没有？”看，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他为此念念不忘“六分之五”就是为了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他一贯地反对教员做到教书又教人，恶毒地说什么“这是不务正业”；他历来反对理论联系实际，拒绝承担战备科研任务，公开宣称什么“理论联系实际不能片面理解，阅遍天下杂志，就是最大的实际！”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主席还指出：“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吴鸿钧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实质就是要抽去无产阶级教育的灵魂，而用资产阶级政治来取而代之。我们要正告吴鸿钧收起你那一套痴心妄想吧！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这是我们永恒的方针。正如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所讲的那样：“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

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反革命分子吴鸿钧凭着反革命的本能，念念不忘“夺权”。为此，他大肆散布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制造反革命复辟的舆论。他不仅有言论，而且还有行动。在我院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居英之流庇护下，吴鸿钧在1962年就窃据了教研室副主任的职务。但他野心勃勃，还嫌另一位副主任（党员）和政治协理员同志妨碍了他们的手脚，便大喊大叫：“两个副主任，谁领导谁？”我系党内走资派高勇之流听之任之，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不经系里讨论，就给他冠以“第一副主任”。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使吴鸿钧的个人野心有所收敛，反而助长之，他狂叫什么：“国家副总理才有个第一、第二，小小的教研室还有什么第一、第二呢？你们为什么不在我的办公室门上写上第一副主任呢？”这个反革命分子竟然当面责问那位党员副主任，胡说什么：“你的副主任是谁委派的？”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协理员，他不过认为协理员是协助他这个副主任工作而已。吴鸿钧的手伸到了各个方面。他竭力排斥党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企图将党支部领导进行的评比、整风，干部定级等工作置于他这个副主任的领导之下。1965年干部定级时，党支部提出了方案，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心怀不满地说：“定级是行政的工作，不是支部的工作。”并十分嚣张地对协理员说：“我这个领导是共产党委任的，不是国民党委任的！”他还威胁说：“是支部领导，还是我领导？”吴鸿钧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四）“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吴鸿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在教研室里挑拨离间，拨弄是非，千方百计拉拢落后分子，攻击支部骨干，当面说人话，背后干鬼事，阴一套阳一套，无所不用其极。

（五）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只专不红，非高价不能‘出售’，说党不能领导，这种看法是把知识看成私有，不是看成人民财产的一部分。”吴鸿钧这个反革命分子正是这样。他用极其卑鄙无耻的手法将图书馆的资料“借”回家，藏起来，据为己有，实行垄断。他“借”书之多，藏书时间之长，都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在他认为有用的图书上，

写着“此书老子所有，他人不得动用！”

为了达到垄断书本的目的，他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宁肯出两倍的钱将书店仅有的两本书全买去，也不愿落在别人手中。不难看出，反革命分子吴鸿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阀！

知识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知识掌握在人的手里就有了强烈的阶级性。吴鸿钧就是以“知识”为资本，疯狂已极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在此，我们还要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露这个反革命分子迫害工农子弟的滔天罪行。1962年有个学员就毕业设计问题找他答疑，吴鸿钧煞费苦心地用日文写了一分资料，在前边用日文写几个字作为题目，然后交给这个学员。这个学员不懂日文，又看不懂数学推导，就直接引用了结论，并在参考资料这一栏上注上吴鸿钧所写的日文字样。几年以后，我们教研室的一位教员翻阅学员的毕业设计，发现吴鸿钧所写的日文字样，根本不是什么题目，而是“信不信由你”五个字。看，吴鸿钧把工农出身的学员当成什么人了！他如此愚弄学员，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不是向广大工农群众、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示威又是什么？

（六）吴鸿钧这个反革命分子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他长期隐瞒家庭成分，唯利是图，而且蹂躏妇女，玩弄女性，道德败坏。衣冠禽兽，丑恶的灵魂无法用语言反映出来，真令人作呕！

人们不禁要问：吴鸿钧这个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事工程学院呢？为什么革命群众不揭发吴鸿钧的反革命罪行呢？

毛主席早就指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相，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多年以来，革命群众对吴鸿钧一直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早在1960年教改时，革命群众就贴出“十问吴鸿钧”的大字报，给他当头一棒，使他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由于我院的大权被三反分子刘居英之流所把持，他们对反革命分子吴鸿钧一再加以保护与怂恿，使其长期逍遥法外。而对革命群众却一压再压。

1961—1962年间，刘居英、高勇之流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这个反动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甄别”、“平反”。他们唯恐革命群众不答应，就亲自出面主持会议，要1960年教改积极分子给吴鸿钧赔礼道

歉。党内走资派的活动博得了吴鸿钧的称赞；吴鸿钧靠着他的后台，也就更加无法无天了。他声嘶力竭地狂叫：“你们斗了我99天108次，我永远忘不了！”并无耻地吹捧自己：“我在1960年教改中是光荣的孤立！”真是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反动透顶！

吴鸿钧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以后，走资派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在一封揭发吴鸿钧1960年以后大量反动言行的信上，刘居英这个混蛋竟亲自用红笔批上：“告诉下边的同志做工作”几个大字。走资派又是怎样告诉下边的同志做工作的呢？这一小撮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406党支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不力”，甚至还以吴鸿钧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为依据，公开在院政工会议上指名批评406教研室支部。高勇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406有成绩，要算是吴副主任一份；有问题要由支部负责任”。这句话就道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吴鸿钧的关系。

不仅如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还对吴鸿钧体贴关怀，无微不至。不失一切机会，为他吹捧，抬高他的身价。

就这样，吴鸿钧这个反革命分子披上了“老教师”的外衣，被精心保护起来。1961—1964年间，这个反革命分子由大尉升为少校；由讲师升为副教授；由副营级升为正营级；由教学小组长升为教研室副主任。真是青云直上，不可一世。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于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被揪出来了，我院党内走资派刘居英，高勇之流被揪出来了，反革命分子吴鸿钧也被我们揪出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402教研室全体同志强烈要求专政机关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吴鸿钧！

打倒反革命分子吴鸿钧！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摘自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革命办公室

《教育革命》第10期 1968.4.12



【资 料】

## 对吴鸿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本刊记者

（本刊消息）4月10日上午院革命委员会在俱乐部召开《掀起揭发检举一切反坏分子新高潮大会》。反革命分子吴鸿钧被揪到台上，不得不低头接受全院革命同志对他的审判。

根据全院革命同志的一致强烈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第二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小组当场宣布：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吴鸿钧，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革命行动大快人心，好极了！它大长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牛鬼蛇神的威风。它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摘自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革命办公室

《教育革命》第10期 1968.4.12

【读者来信】

叶维丽谈“清华工宣队”一文

今天看了最近一期“记忆”，觉得唐少杰的文章真是很好，好在不但清晰地讲述了清华的事，而且以此为“脖领子”，“领起”1968年7月直到1976年秋的若干重大事件，如全国规模派遣“工宣队”（我意工宣队应加引号），“清理阶级队伍”，“教育革命”，批邓，等。一个极好的审视1968年夏后文革史的角度。如果说文革初期还有个“上下互动”（如清华附中自组“红卫兵”），此时的号令直接来自“天庭”，不过是借“工宣队”的名儿罢了。

我对清华“井冈山”“4.14”之争有浓厚兴趣，当年就觉得文革中最有“理论”的是清华人（连文章也比北大写得好）。“工宣队”“占领”清华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在校园外观看，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文攻”水平最高的“学府”最终成为京城“武卫”之最，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琢磨。

2015—5—11 于波士顿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